

館藏臺灣西部大坵坑文化陶片刻劃紋研究

葉美珍*

摘要

距今 6500 至 4200 年間的大坵坑文化，已知遺址分布全臺，初估已發現 60 餘處遺址，大坵坑文化陶器於器形與紋飾均具特色，成為辨識大坵坑文化之主要器物。在器形方面以盤口陶罐最具特色，尤其帶突脊之斂盤口罐可能為早、中期陶器代表，紋飾方面則包括繩紋、彩繪紋及刻劃紋，三類紋飾中保存機率較繩紋低但較彩繪紋高很多的幾何形刻劃紋，不僅因其辨識度高而成為大坵坑文化陶器紋飾特徵，最重要的是可傳達工匠對於陶器紋飾設計之邏輯，故以刻劃紋作為研究主題，一窺大坵坑文化陶器紋飾設計美感，及其文化傳承之意義。

2013 年先整理 20 年來採集之東部海岸 6 處遺址出土大坵坑文化刻劃紋陶，針對紋飾圖案作採繪、歸納、研究，將大坵坑文化刻劃紋歸納為直線系圖案及弧線系圖案，並初步探討東部陶器紋飾於時空中之傳承與變化，以及與西部大坵坑文化的關聯性。東海岸類型屬大坵坑文化中晚期，其紋飾與北部大坵坑遺址及南部鳳鼻頭遺址有所類似，顯示東部大坵坑文化陶器形式雖多已簡化，然明顯承自西部的主要紋飾，由東部地區工匠傳承且發展變化形式而成為地方特色。

在探討大坵坑文化中晚期於東部之發展後，本文進一步探討西部大坵坑文化陶器紋飾。研究標本陶片二百餘片來自捐贈及田野工作採集，出自臺灣西岸北、中、南區 8 處遺址，包括臺北大坵坑遺址、芝山岩遺址；臺中榮泉村遺址；臺南網寮遺址、八甲遺址；高雄六合遺址、孔宅遺址、新園遺址等，標本為一手資料且多為首次報導。本文主要呈現西部大坵坑文化器形及刻劃紋圖案，從中歸納、探討西部大坵坑文化紋飾系統。

由於大坵坑文化刻劃紋系統維持長久時間不墜，顯示圖案具有傳承之意義，除探討其在臺灣之發展外，或可作為外部環境探源線索。

關鍵詞：大坵坑文化、刻劃紋、芝山岩遺址、六合遺址、孔宅遺址

*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研究典藏組副研究員。yemt@nmp.gov.tw

一、前言

臺灣新石器時代距今約 6500 至 4200 年前，大坌坑文化傳布於全臺灣，目前確定遺址及疑似遺址陸續增至 60 多處，半數分布北部地區，中部、南部(併及澎湖)、東部各約 10 多處(劉益昌、陳仲玉、陳光祖 2004；臧振華、陳仲玉、劉益昌等 1995；劉益昌、陳俊男等 2007；郭素秋 2008；臧振華、陳仲玉、劉益昌等 1994；劉益昌、許清保、顏廷仔 2008；劉益昌、顏廷仔 2010；臧振華、葉美珍等 2000；劉益昌、潘常武等 2000)。各遺址保存遺物、現象之種類與狀況差距頗大，然其中施有刻劃紋之陶片仍是最直接可作為辨識大坌坑文化之特徵標本，亦即大坌坑文化遺址之確定幾乎以刻劃紋陶片出土為依據。除此一重要性外，因其紋飾以幾何圖案為主，充滿圖形均衡設計之美感，似具有文化意義及選擇性，直言之，紋飾圖案有如工匠表達之文化意念，故以紋飾圖案為主題，探討大坌坑文化陶器之刻劃紋系統。

此議題難度在於案例累積不易，除極少數遺址出土量較多外，多數遺址僅出土少量帶刻劃紋陶片，而且僅少數遺址保存原始文化層位。在此限制下，2013 年由年代處大坌坑文化中晚期之東部紋飾開始作探討。東部刻劃紋陶片保存數量較西部來得稀少，筆者 20 年來與同事李坤修於花東海岸 6 處遺址採集之標本探討東部大坌坑文化刻劃紋飾系統。文中針對 6 處遺址陶片標本所採集 60 多種圖案作探討，紋飾元素區分為直線系及弧線系兩大類，直線系含直線紋、交叉紋、曲折紋、梯紋，弧線系元素為波浪紋、S 形紋等，計 6 類圖案。而且初步與已發表之大坌坑遺址及鳳鼻頭遺址等刻劃紋圖案相較後，顯示東部紋飾與西部所見直線系與弧線系圖案大致類同，有直接類似之處，亦有東部發展之變化形，尤以 S 形紋最為顯著。亦即若按照目前對大坌坑文化年代之推測，則其陶器紋飾傳統於全臺幾乎維持 2000 年時間。

在初步確定東部類型陶器紋飾承自西部地區後，本文整理館藏西部地區 8 處大坌坑文化遺址出土陶片標本，以之探究西部紋飾系統，有利於後續結合東部紋飾綜觀全臺刻劃紋飾之發展，且西部大坌坑文化陶器保存更多早期發展特徵，或更接近其來源之文化特徵，有利於文化溯源之探討。

二、標本來源與研究方法

(一) 陶片標本來源

本文研究標本為館藏¹西部大坌坑文化遺址帶刻劃紋陶片，標本包括捐贈陶片以及筆者與同事於田野工作所採集，陶片所出 8 處遺址分處臺灣西部北、中、南三地區。

¹ 指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本館」所藏。

其中北部標本出自大埕坑遺址、芝山岩遺址等，標本來源為盧錫波收藏(家屬捐贈)。中、南部標本來自郭德鈴收藏(家屬捐贈)²，中部地區為 2 片出自榮泉村遺址標本，南部地區標本包括網寮遺址、八甲遺址。田野採集標本全部來自南部地區，多數出自六合遺址及孔宅遺址，少量採自網寮遺址及新園遺址標本³。

各遺址標本保存狀況不同，捐贈標本主要來自地表採集，因採集者通常篩選狀況較好之標本，故紋飾多半保存良好。六合及孔宅遺址標本出自地表調查及探坑發掘，標本數量雖然較多，但多數標本保存狀況不良，因此本文觀察標本以其中保存明確紋飾者為主，其次為紋飾較殘缺、模糊者或雖未保留紋飾但器形符合典型特徵者。各遺址標本數量分部位統計如下表。

表 1 各遺址標本分類數量統計表

	罐口緣	鉢口緣	折肩	腹片	足	計
大埕坑	8	2	1	-	-	11
芝山岩	39	8	0	-	1	48
榮泉村	-	1	-	-	1	2
網寮	32	-	13	-	-	45
八甲	6	2	3	1	-	12
新園	2	-	-	-	-	2
六合	48	1	9	10	-	68
孔宅	46	2	13	3	-	64
計	181	16	39	14	2	252

(二) 紋飾呈現與取樣

本文呈現圖案以手工繪圖方式擷取⁴，解讀陰線形成之圖案，1 道黑色線條代表 1 條陰線紋，圖案採樣時盡可能接近原始施紋風格，不作美化、修整，以反映施紋技術差異性。

² 捐贈者採集之地表採集標本，或可能有遺址資訊誤差機率發生，上述兩批捐贈標本均由筆者與同事李坤修承辦初期整理工作，當時對於標本採集地點，均得以向採集者本人或捐贈者求證與釐清，確保出土遺址資訊之正確性。

³ 六合遺址及孔宅遺址標本為筆者與同事李坤修於 1997 年執行之發掘工作所採集(陳義一 李坤修 葉美珍等 1998)。少量網寮遺址及新園遺址標本來自李坤修 2008 年以後地表採集。

⁴ 線條圖案採樣可採拓印、手繪圖、電腦繪圖等方法，因樣本陶片大多保存不良，無法拓印出清晰紋飾，而電腦繪圖全面整齊化、美化線條，無法傳達施紋技術差異，故在此階段先以手繪圖採樣，有利於表現施紋之精粗差異，本文繪圖者主為李敏青先生。

在紋飾研究中，陶器圖案元素可單獨連續施作，亦可複合組成圖案。由於陶片保存紋飾之完整程度差異很大，因此連續性複合圖案中單元截取範圍需藉由其他遺址案例之觀察經驗來作判斷。參考案例來自東部港口遺址，該遺址採集 9 組 36 個圖案中多數為複合圖案，且為連續紋飾，在獲得此一觀察經驗後，西部案例即使僅存局部紋飾仍可判斷其整體紋飾之歸類。

由於 8 處西部遺址之複合紋飾案例不多，且大多數圖案不完整，故不以分類陳述，而是逐一描述取樣標本，並盡量以標本圖及照片呈現，以顯示每一個案例的重要性。

（三）紋飾案例介紹順序

本文呈現 8 處遺址之實體標本並作探討，由於個別遺址標本數量差異大，其中以北部及南部標本數量較多，因此敘述時以實體標本數多寡為順序，加大坌坑文化遺址以北部遺址及南部遺址發現較早，且器形與紋飾皆具典型，故以下章節將依標本數量較多之北部遺址、南部遺址之序進行，最後為標本數較少之中部遺址。

而在同一區域中，亦按照實體標本數量之順序介紹遺址案例，例如在遺址案例數較多之南部區域，將以實體標本數最多之高雄六合、孔宅遺址起始，最後為標本數較少之臺南網寮遺址。各區域之後並列出同區域其他遺址已發表圖案採樣作為輔助資料。

三、研究標本器形與紋飾概述

在呈現 8 處遺址陶片紋飾之前，於觀察陶片復原之器形及紋飾後，在此作一綜合歸納與概述。

（一）器形概述

大坌坑文化陶器除所施印紋外，器形亦具特色。本文研究標本施紋部位包含口緣、折肩、腹部，以及少量圈足，所歸納之器形侷限於罐、鉢，以及少數豆形器。

罐形器依其口緣開敞角度大致分為直口系列及敞口系列，直口系列其內頸開敞度近直，藉由凹折及帶突脊造成器形變化⁵，大致包括盤口、直口、帶外翻領口、寬頂口等四類。第一類盤口⁶分為直盤口(圖 2-2)及斂盤口(圖 6)，在頸線之上多存在外凸程度不一之脊線，其中斂盤口因斂折形成較明顯突脊而成為最具特色之口緣類型，尤以突脊以上部位稍作凹弧化以彰顯斂口角度之口緣最具代表性，口緣紋飾難度亦較高。斂盤口藉突脊

⁵ 大坌坑文化陶器形制反映製作技術、邏輯及時代變遷現象，其複雜度需以專文討論，本文僅就形制作歸納概述。

⁶ 即臺灣研究者(含筆者)習稱「帶突脊陶罐」，其形制與中國大陸自繩紋時代陶器至晚近瓷器所長期發展的盤口器形是相符的，由於大坌坑文化短口陶罐多基於盤口形制作細節變化，為利於陳述，本文以盤口稱之。

位置高低及厚度差異發展出各種變化形。至於直盤口之突脊較不明顯且位置偏低，部分器形幾近直口罐。

第二類直口類型包括不同高度之高低直口(圖 25-1)，少數高直口於口緣中、低段仍帶低突脊。第三類為高低直口頂部外翻，形成外平沿(圖 20-1)或外斜領(圖 8-1)兩亞類，外平沿見於高低直口，外斜領多見於低口，因口緣較低又順應外接斜領，口部已略為外敞。口緣所帶平沿與斜領又因寬度不同而形成變化。第四類寬台口緣為低直口帶內折沿(圖 37)，形成寬頂口緣，頂面厚度有其變化，紋飾施於頂面。

上述第二至三類關係密切，差異可能僅在於附屬部位如平沿或外斜領的有無，後三類口緣亦與第一類口緣有部分製作邏輯可作互相對應。綜合而言，四類口緣藉由口部(含附屬部位)高矮、寬窄、厚薄及開口角度斂放等差異形成變化，製作重點似在於創造可施印紋面之厚度、角度與位置。

相較於直口罐口緣，敞口罐口緣較少附加特徵，差異在口緣外敞角度、口緣寬度以及口緣面的弧度變化，多數口緣面呈平直狀(圖 26-2)，少數為弧凸狀(圖 19-2)或內凹狀(圖 26-3)等變化，其中內凹狀口緣施紋難度較高。

鉢口緣亦有斂口、敞口之別，第一類斂口鉢接近斂盤口特徵(圖 9)，口部斂折類似折肩或帶突脊，第二類敞口鉢包含不帶沿及帶沿二種，前者為碗形腹體不加口沿(圖 28-2)，後者為碗形腹體加外敞之沿，本文陶片樣本並無帶沿鉢。歸類為豆形器者為圈足部位陶片，數量很少，主為高圈足器形。

上述陶器口緣在各遺址分析標本章節中皆可見案例，其中斂盤口帶明顯突脊者被認為是大坵坑文化早期陶器類型，可作為時間指標。

(二) 主要紋飾類型

本文延續東部紋飾觀察中對於直線系與弧線系圖案之歸類⁷，直線系圖案包括直線、交叉紋⁸、曲折、梯紋等類(圖 12)，弧線系包括 S 形紋及波浪紋等類(圖 13)，這 6 類圖案基本元素，可以單獨連續施作，亦可由 2 類以上組成複合圖案。直線系圖案由直線組合構成許多圖案，除單純長、短直線外，基本構圖為交叉、曲折及梯紋，3 類圖案有其相通及關聯性，例如曲折紋可變化為梯紋及編織紋，連續交叉線紋可構成方格、菱格網紋，多線交叉圖案亦可構成編織紋或籠目紋。其中「梯紋」一類較為複雜，為長線與短線組合而成圖案，最典型紋飾為直線內夾橫線(圖 4-7)，形成極類似「梯」之形狀，其變化包括長直線內夾短斜線(圖 4-8)、短直線(圖 14-5)等，其組合形式為數個紋飾直式並聯或呈

⁷ 本文探討紋飾未含不易保存之彩繪紋飾，刻劃紋陶片尚可見少量自然物印紋，此類自然物印紋主為類似植物種子或豆類所形成圓形、橢圓形印紋，該類印紋在觀察標本中多作為圖案之附屬裝飾，不在主要探討範圍。

⁸ 本文以較廣義之交叉紋涵蓋網格紋及編織紋。

曲折並聯，後者雖亦具曲折紋特徵，於文中歸為曲折式梯紋，視為梯紋變化形式。

上述類別可涵括多數圖案，但仍有零星案例超出其範疇。此外較大面積之複合式圖案，則以主體紋飾歸類，例如圖案為大範圍 S 紋襯以短線紋，則歸類為 S 形紋。

(三) 年代框架

臺灣考古研究者對於大坵坑文化年代之推測框架在 6500 年前至 4200 年前間上下移動。以往大坵坑文化絕對年代主要來自西部遺址，如八甲遺址曾以貝殼標本作碳 14 測定，得到數據最早為 5645±60B.P.(黃士強 1974:66)，校正年代為 6475±170(黃士強 1984:75)，故大坵坑文化年代被推測可能存在於距今 6000 至 7000 年前，此一貝殼標本碳 14 定年數據或存在年代偏早之疑慮，但在研究之初期亦指出一個年代參考方向。

近年研究者根據北海岸地區標本將大坵坑文化陶器以陶質分為 5 類，以近泥質第 1 類陶及細砂質第 2 類陶歸屬為大坵坑文化早期，3 至 5 類之粗砂褐色陶及細砂褐色陶歸屬為晚期陶器。並依該地區所得到的陶片熱釋光定年或有機物碳 14 定年數據，往下修正為早期 5500B.P.至 5000B.P.，晚期 5000B.P.至 4500B.P.(劉益昌 1997、趙金勇 2012)。

在多數大坵坑文化遺址缺少絕對年代證據之下，研究者再根據陶器器型與施紋之相對水準，以是否存在帶突脊陶器口緣作為標準，提出大坵坑文化陶器三分期的看法，早期有明顯突脊，劃紋較不工整；中期突脊仍存，劃紋工整；晚期突脊、劃紋消失。出土帶突脊盤口陶器口緣之早中期遺址包括北部大坵坑、水碓尾、龜子山、莊厝、芝山岩、圓山，南部六合、孔宅、福德爺廟、八甲等(郭素秋、劉益昌 2005)。

晚近則有幾處保存大坵坑文化層之遺址提供具關鍵性之絕對年代，如南關里東等遺址保存 4800B.P.至 4200B.P.間推測屬於大坵坑文化葉葉期遺留(臧振華、李匡悌、朱正宜 2006)，亦有研究者將八甲類型參考年代放在 5300-4800B.P.間(陳有貝、陳俊廷 2013:106)。

東部遺址在器形與年代方面具有其關鍵性，東部出土斂盤口罐之長光遺址，其陶片熱釋光年代早於 5600B.P.，而完全無盤口陶罐出土之港口遺址其碳 14 年代最早為 4590±70B.P.，校正後為 B.C.3523-3089，以 5500.B.P.-5000B.P.概括之。此外綜合東部 4 處遺址⁹絕對年代資料後顯示東部類型約處於 5600 B.P.-4200B.P.間(葉美珍 2010、2014)。

筆者頗認同上述帶突脊盤口器形為早、中期陶器類型之看法，在與東部類型年代對照下，北部及南部斂盤口罐存在年代應早於港口遺址年代。最近出土斂盤口罐之高雄新園遺址以木炭標本獲得碳 14 定年數據 5570±70B.P.，校正後為 6497 B.P.-6216B.P.(顏廷仔 2013:109)，此一數據或需商榷，然暫使大坵坑文化年代框架存在上移之可能性，再依據文中對於器形及紋飾之觀察結果，推測大坵坑遺址與芝山岩遺址應具有與新園遺址年

⁹ 包含長光遺址、鹽寮遺址、港口遺址、卑南遺址。

代同時之遺存，尤其芝山岩遺址部分紋飾可能相當早，因此本文採用 6500B.P.至 4200B.P. 年代框架作為紋飾探討之依據。



圖 1 北部地區遺址位置示意圖

四、北部地區標本及紋飾案例

北部地區早期發現之遺址包括臺北大坌坑遺址、芝山岩遺址及圓山遺址等，多數大坌坑文化遺址分布於淡水河口至北海岸(劉益昌 1997)。本節所討論大坌坑文化刻劃紋陶出自大坌坑遺址及芝山岩遺址，並輔以北海岸遺址出土案例。

(一) 新北市大坌坑遺址

1、標本簡介

本文觀察大坌坑遺址刻劃紋陶片 11 片，包括罐口緣 8 片、鉢口 2 片以及折肩 1 片。陶片偏淡橙色系，未燒透胎色呈灰至黑灰，胎土夾稀疏可見砂。其中 8 片保存狀況較好，分別為罐口 6 片，鉢口 1 片，折肩 1 片，可作為器形及紋飾代表。

(1) 罐形器

(i) 口緣

6 片罐口緣帶紋飾，所代表器形包括盤口罐 4 件及帶斜領罐 2 件，紋飾主題多為波浪紋。盤口中僅 1 件口緣可復原口徑為 22cm，紋飾主題為 5 道 2 線橫式波浪紋，兩側以 2 線直紋為界，環繞口緣外側，銜接空白處再補 1 道 2 線直紋，口緣唇面施作 2 道 2 線短線(圖 2-2、圖版 1)。其他有 2 件盤口於口緣外側施 2 道 2 線波浪紋，其中 1 件腹部亦施多道 2 線波浪紋，頸部波浪紋施作或有不整齊處，底部以平穩橫線區隔圖案範圍(圖 3-1、3-2，圖版 2、3)。第四件盤口圖案為 2 線直紋內夾 3 道 2 線橫紋，圖案下方以 1 排直式粒狀印紋區隔頸線(圖 3-3、圖版 4)。

2 件帶斜領罐口中，1 件可復原口徑 13.5cm，為小型器，器表殘留褐色。領面及頸線以下腹部皆施紋飾，領面主題為 4 道 2 線橫式小波浪紋，腹部保存紋飾為 5 道 2 線橫式波浪紋，兩側各以 2 道併排 2 線梯紋為界，梯紋內為 2 線右斜短紋(圖 2-1、圖版 5)。另 1 件帶斜領罐口雖無法復原口徑，但器型較大，窄領面殘存局部 2 線波浪紋，頸線以下為 2 線曲折紋(圖 3-4、圖版 6)。

(ii) 折肩

1 片折肩片轉折角度緩和，器表保存 4 道直式併排 2 線梯紋，內夾左斜短線，底部以一橫線區隔施繩紋部位(圖 3-6、圖版 8)。

(2) 鉢形器

1 件鉢口為斂口帶平脊之特殊形制，環口裝飾 2 線曲折紋之變化型，於上下開口之橫式曲折線中間再加 1 道直線，線條交接略如「个」形(圖 3-5、圖版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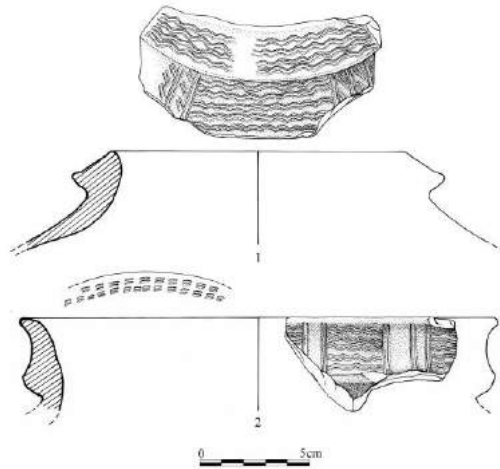


圖 2 大盆坑遺址可復原口徑之帶外斜領罐口(1)、盤口罐口(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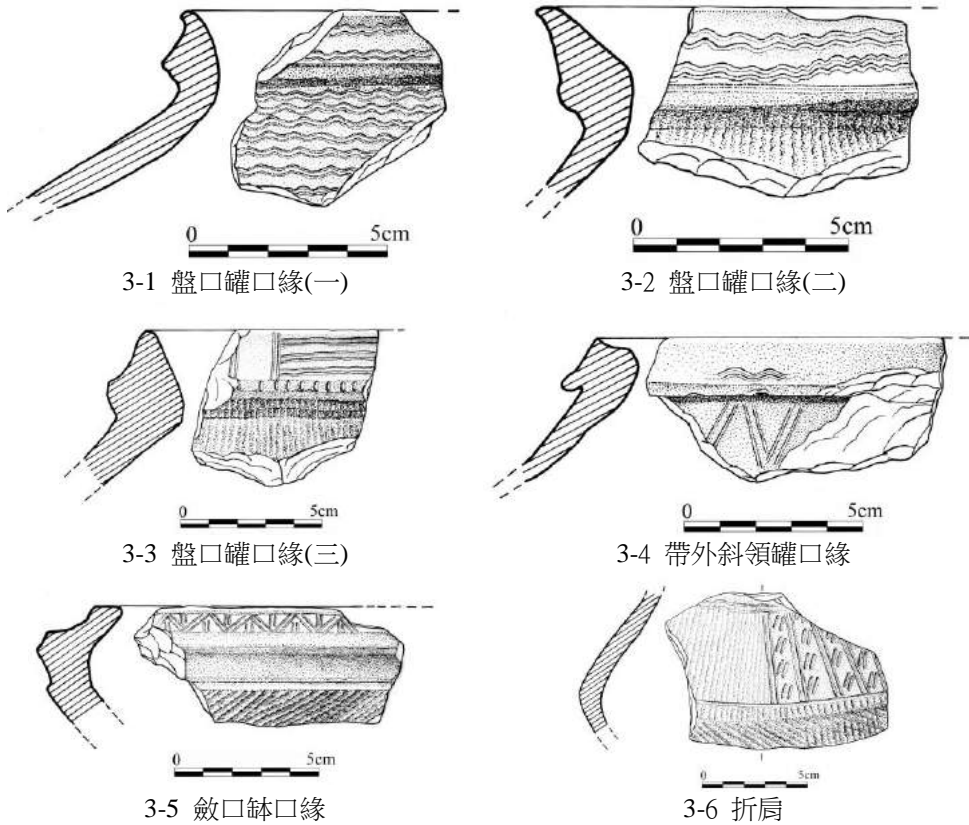


圖 3 大盆坑遺址罐口、鉢口(未復原口徑)以及折肩

2、紋飾分析

綜合上述標本所帶紋飾及已知案例顯示，大坌坑遺址紋飾以直線紋為主，弧線紋則為小波浪紋複合圖案。

(1) 直線系圖案

直線圖案由 2 線紋構成，除基礎之長、短橫線外，其他為橫式、直式曲折紋，以及交叉紋、梯紋，又以曲折紋及交叉紋比例較高，曲折紋中以「个」形紋為少見之類型。



4-1 橫短紋



4-2 交叉紋
(Chang 1969 plate21E)



4-3 曲折紋(一)
(Chang 1969 plate19D)



4-4 曲折紋(二)
(Chang 1969 plate21D)



4-5 曲折紋(三)
(Chang 1969 plate22A)



4-6 曲折紋(四)



4-7 梯紋(一)



4-8 梯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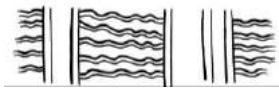
圖 4 大坌坑遺址直線系圖案

(2) 弧線系圖案

以波浪紋為主的複合圖案，係由橫式 2 線波浪紋與直線、梯紋所構成，其中 1 例波浪紋可見略作曲折化處理(圖 5-1)。



5-1 波浪紋(一)
(Chang 1969 plate21D)



5-2 波浪紋(二)



5-3 波浪紋(三)

圖 5 大坌坑遺址弧線系圖案

(二) 臺北市芝山岩遺址

芝山岩遺址位於台北市士林區芝山岩一帶，石角溪岸邊之孤立小山¹⁰。

1、標本簡介

本文觀察芝山岩遺址刻劃紋陶片 48 片，包括罐口緣 39 片、鉢口 8 片及足部 1 片。陶片呈淡橙色至橙色系，未燒透胎色呈灰至黑灰，胎土含砂程度由幾乎無可見砂至夾雜密集可見砂均有，無砂及夾密集砂標本多呈橙紅色，所占數量較少，多數標本摻稀疏可見砂。其中具器形特徵且刻劃紋保存較好者包括罐口緣 15 片、鉢口 6 片以及足部 1 片，可作為器形及紋飾代表，以下分別敘述。

(1) 罐形器

15 片罐口緣所具器形包含 13 件斂盤口及 2 件帶外斜領口緣，其中 8 件可復原口徑，不可復原口徑者 7 件。

(i) 盤口

6 件斂盤口復原口徑介於 8.9cm 至 22.2cm 間。最小 1 件罐口帶 2 線橫短紋，以平行 2 道紋飾環口裝飾，屬於基本紋飾類型(圖 6-1、圖版 9)。第二件口緣之唇寬 0.9cm，環唇面飾 2 線橫短紋。口緣外側寬 2.2cm，圖案為 4 道 2 線橫式波浪紋，兩側各接 2 線直式梯紋，梯紋內短線右斜，頸線保存繩紋，下接 2 線橫式連續 S 形紋至少 2 道，S 形紋長線之表現為弧、折兼具(圖 6-2、圖版 15)。

第三件口緣外側寬 2.6cm，裝飾 2 線上下曲折連續紋，於橫式曲折上下開口中間再加 1 道直紋，線條交接略呈「个」形(圖 6-3、圖版 13)，與前述大盆坑遺址鉢口紋飾相同。

第四件口緣唇線帶凹刻紋，口緣外側帶明顯突脊，口緣施紋面寬 2.5cm，裝飾 2 線併排直式梯紋，內部短線右斜，突脊上裝飾橢圓形類似豆狀印紋(圖 6-4)。

第五件口緣唇線帶切刻紋，口緣外側寬 3cm，裝飾 4 線上下曲折連續紋(圖 6-5、圖版 12)。

¹⁰ 民國 68 年兩農國小興建教室以及學校前公路安裝箱涵均出土不少史前遺物(黃士強 1984)，本文所探討刻劃紋陶片即為盧錫波於當時芝山岩一帶各項工程中所採集標本。

第六件口緣外側施紋面寬 2.5cm，圖案為 3 道平行 2 線波浪紋接 3 道 2 線直紋。突脊線帶一不甚圓之穿(圖 6-6)，可能是殘損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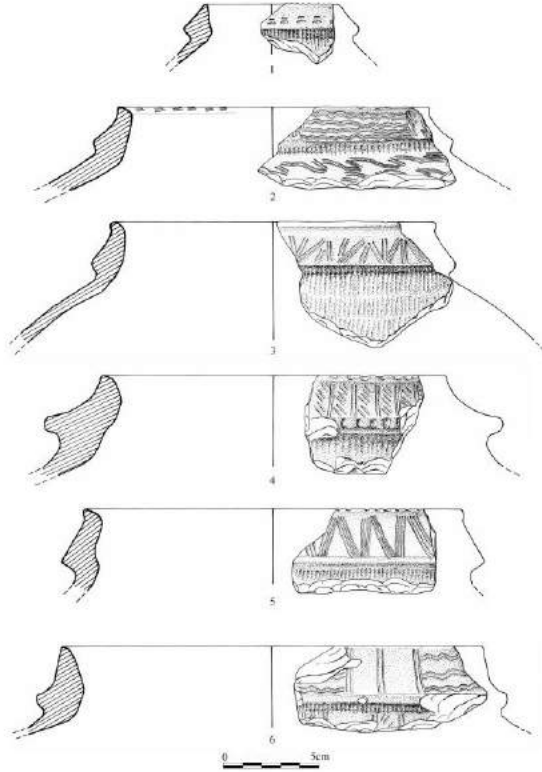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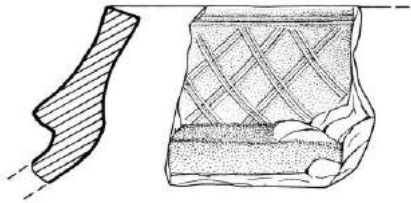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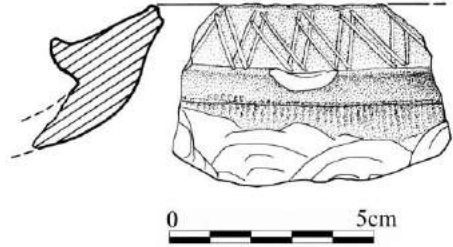
圖 6 芝山岩遺址斂盤口罐口緣

無法復原口徑之 7 件斂盤口罐，口緣所帶紋飾包括以下：(1)、2 線菱格網紋，近唇線處以橫線區隔圖案(圖 7-1、圖版 10)；(2)、2 線上下曲折紋，紋飾深刻，交叉線條重疊處之線條印痕清晰，未互相干擾(圖 7-2、圖版 11)；(3)、2 線並排梯紋，內部容納 2 行並列左斜短紋(圖 7-3)，屬少見案例；(4)、唇面以一系列 2 線短紋環繞，口緣外側飾 2 列 2 線波浪紋兩側各接 3 線直紋，波浪紋曲折化，圖案下方以 1 列 2 線短紋為界線(圖 7-4、圖版 16)；(5)、直式並排 2 線梯紋，內夾右斜短紋(圖 7-5)；(6)、唇面飾不連續 2 線波浪紋，口緣外側施 2 線梯紋，2 道梯紋併連成一單元，左斜梯紋接右斜梯紋，連續施作，形成上下曲折式梯紋，而不論梯紋之走向為何，內部所夾短線均為左斜(圖 7-6)；(7)、唇面以一系列 2 線短紋環繞，口緣外側紋飾簡化，包含 6 線直紋、2 線直紋，突脊面平坦，帶橢圓印紋，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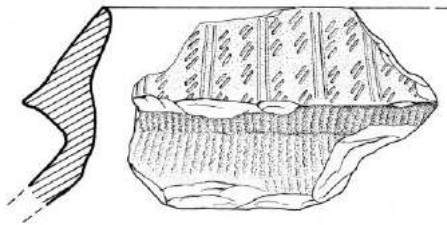
面下亦施 4 線直紋¹¹(圖 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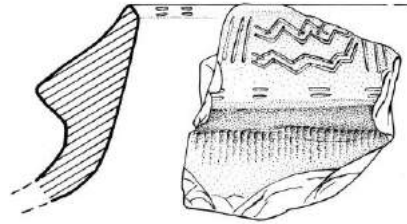
7-1 斂盤口罐口緣(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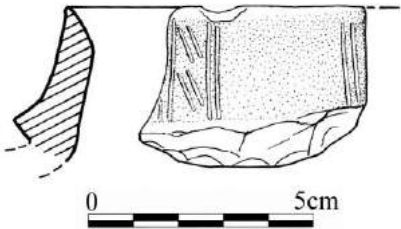
7-2 斂盤口罐口緣(二)



7-3 斂盤口罐口緣(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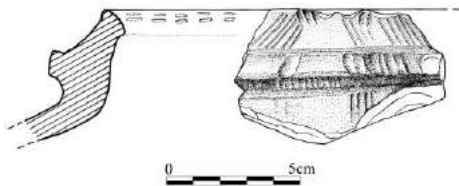
7-4 斂盤口罐口緣(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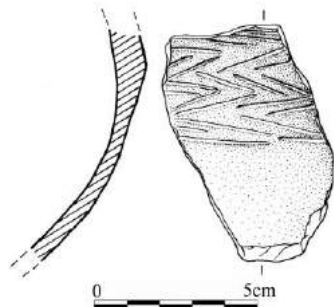
7-5 斂盤口罐口緣(五)



7-6 斂盤口罐口緣(六)



7-7 斂口罐口緣(七)



7-8 高圈足殘片

圖 7 芝山岩遺址斂盤口罐口緣及圈足殘片

¹¹ 此標本殘存體積小，雖暫列為罐形器然由其平脊特徵研判亦有屬於斂口鉢之可能性。

(ii) 短口帶外斜領

2 件帶斜領口緣，第一件為寬斜領類型，領寬 3.2cm，圖案為以間距 2mm 之 2 道 3 線直紋形成一單位，間隔 8mm 的 2 個單位計有 4 道 3 線直紋構成主圖案(圖 8-1、圖版 17)環口緣面連續施作。

第二件為窄領類型，領寬 1cm，唇面帶凹刻，圖案為 3 橫線繞口，下接 1 圈橢圓形印紋(圖 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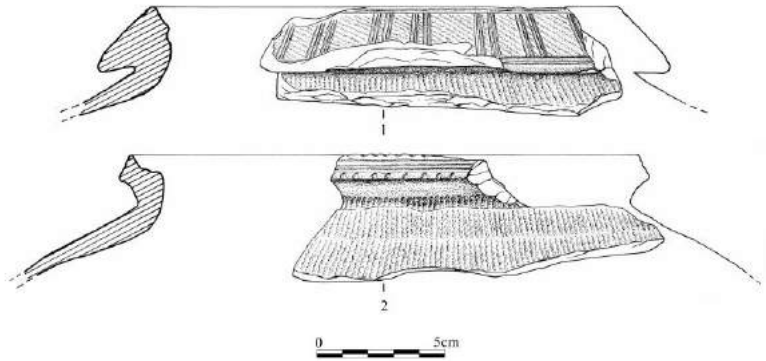


圖 8 芝山岩遺址帶外斜領罐口緣

(2) 鉢形器

7 件鉢形器復原口徑介於 14cm 至 21cm，除 1 件屬直口不帶沿外，其他 6 件均為斂口鉢，帶明顯脊線或折肩。第一件斂口鉢，泥質薄胎，所帶突脊尖翹，唇寬 0.5cm，環唇面帶 3 線短直紋，口部施紋面略內凹，形成外翹突脊，施紋主題複雜。其圖案為 3 線直式波浪紋接 3 線直紋，10 多道連續拼接而成，主圖案間以 3 線直紋區隔，波浪紋及直線紋緊密，偶見歪斜或 3 線變 2 線之失誤。圖案近脊線端以 2 線橫波浪紋作界，近唇線端以橫線區隔，脊線施凹刻成小波浪狀。整體裝飾具繁複而華麗之感(圖 9-1、圖版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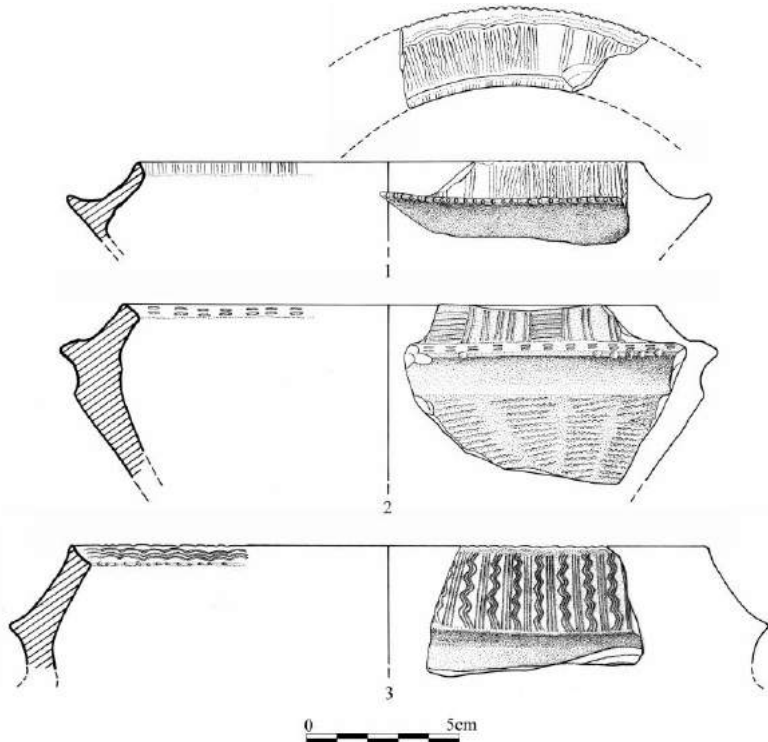


圖 9 芝山岩遺址 3 件斂口鉢形器

第二件斂口鉢，突脊下之腹體略凹縮而使脊面更見明顯，唇寬 0.7cm，環唇面帶 2 線短橫紋。口部外側圖案為 2 線梯紋，長線內夾 3 道平行 2 線橫紋，橫線密接長線，為最典型之「梯紋」，側接 3 道 2 線直紋，連續施作。脊面寬 0.5cm，裝飾與唇面相同之 2 線短橫紋(圖 9-2、圖版 20)。

第三件斂口鉢，器形似前一鉢口，但體積較大，其突脊縮小。唇寬 0.9cm，唇面略凹，環唇面帶 3 線波浪紋，波浪紋下方為 1 圈細小圓印紋。口部外側紋飾與前述第 1 件鉢口相同而施作更為精準。3 線直式波浪紋接 3 線直紋，連續至少 10 道紋飾相接(圖 9-3、圖版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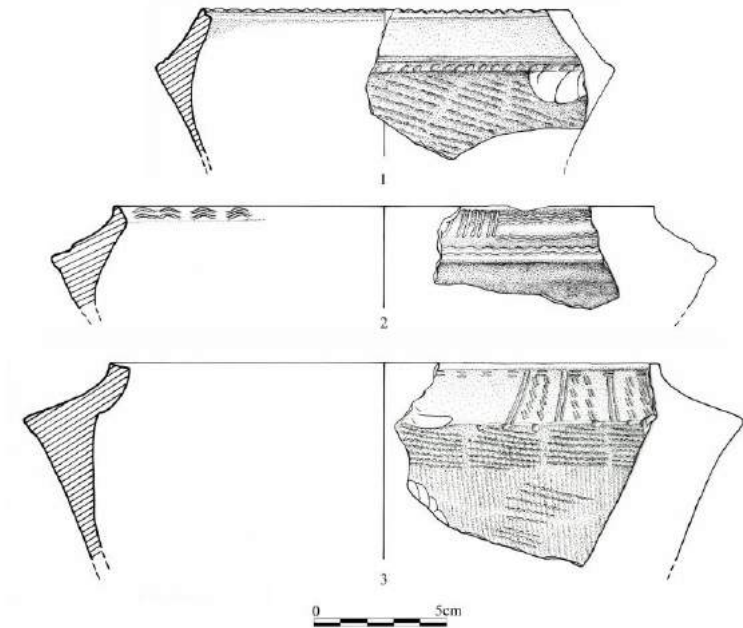


圖 10 芝山岩遺址 3 件斂口鉢形器

第四件斂口鉢，口徑僅 14cm，為小型鉢。唇線帶凹刻呈小波浪狀，口部外側未見紋飾，因器表較粗糙，可能紋飾已佚失。脊線不甚明顯，裝飾橢圓形印紋(圖 10-1)。

第五件斂口鉢，唇寬 0.8cm，環唇面帶不連續 2 線波浪紋。口部外側紋飾為 2 道橫式平行 2 線波浪紋側接 3 道 2 線直紋。在此圖案下以 2 線橫波浪紋作為界線(圖 10-2)。

第六件斂口鉢，器表保存良好。唇寬 0.8cm，未見紋飾。口部外側紋飾為 2 線直梯紋併連施作，內部為 2 行右斜短紋，圖案上端以 1 列 2 線短紋為界，下端環脊線施 1 列凹刻印紋(圖 10-3、圖版 22)。梯紋內夾並排 2 行斜短紋，此圖案亦見於前述斂盤口罐(圖 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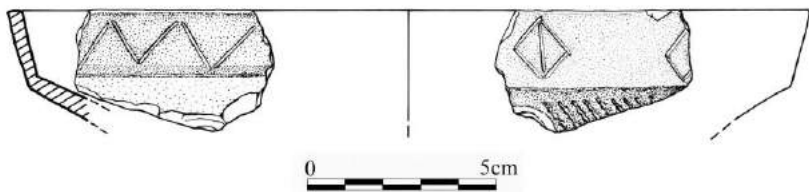


圖 11 芝山岩遺址直口鉢

第七件標本殘餘部位小，未見同類器形，暫列為直口(不帶沿)鉢形器¹²，陶鉢胎薄，器壁均勻，厚約 0.4cm。口部外側寬 2.1cm，紋飾為稀有之單線菱格內加 1 直線，有如將菱格從中劃分為 2 個三角形。鉢口內側施單線橫式曲折紋(圖 11，圖版 23、24)。

(3) 豆形器圈足

唯一圈足片，可能為豆形器圈足，足下端開敞角度大而略如盤足。圖案似較凌亂之單線直式曲折紋，亦形似「人」字紋，錯落分布，產生類似曲折紋但更具變化與線條動感(圖 7-8、圖版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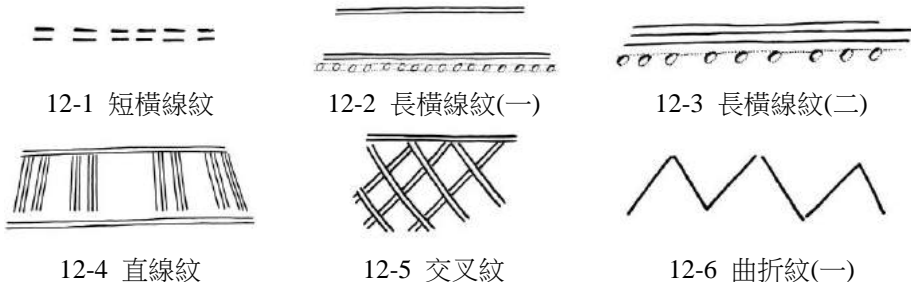
2、紋飾分析

本遺址綜合採集紋飾包括直線系及弧線系圖案，另有少量粒狀印紋常與橫線或直線圖案搭配。

(1) 直線系圖案

直線紋包含基礎的長、短橫線及長、短直線，單純線條可作為主題圖案，亦可作為圖案區塊之界線。其他包括 1 線、2 線、4 線曲折紋，及 1 線人字紋、2 線菱格紋、2 線梯紋。其中 2 線曲折紋之「个」形變化型亦見於大盆坑遺址，其與 1 線人字紋是直線系中少見紋飾案例。

圖案中最稀有的是前述薄胎直口鉢所帶單線菱格紋(圖 12-11)，其內側飾單線曲折紋(圖 12-6)，2 種紋飾均屬少見，後者若單獨出現可能令人誤以為是未完成作品或是紋飾保存不全所致，而當 2 種圖案出現於 1 件陶器時則表現出施紋風格的一致性，單線菱格紋並未連續施作，顯示與其他繁複而連續施作風格有所不同，其簡約風格或可能屬早期紋飾。



¹² 此陶片亦可能為盤口釜，在此暫列鉢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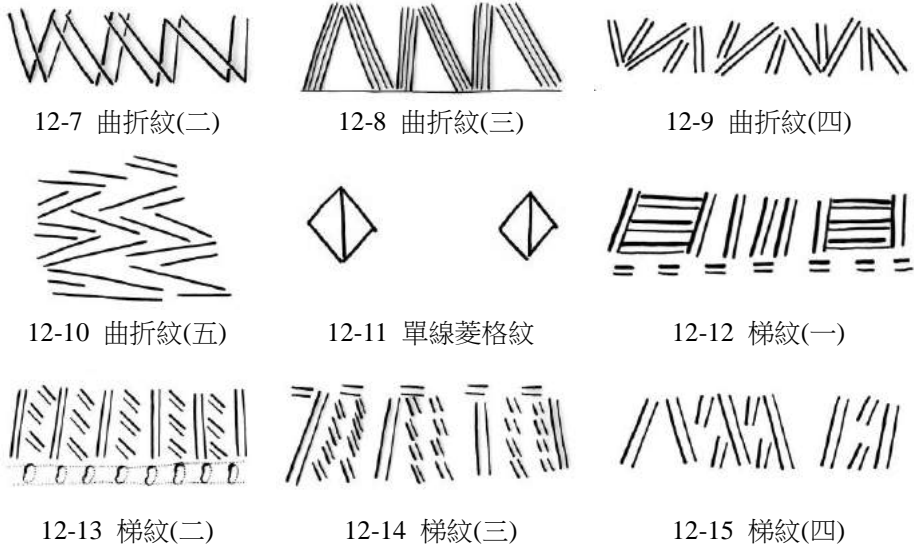


圖 12 芝山岩遺址直線系圖案

(2) 弧線系圖案

弧線系包括 2 線橫波浪紋、3 線橫波浪紋、3 線直式波浪紋；2 線 S 形紋。北部遺址少見 S 形紋，本遺址 S 紋標本屬於稀有案例(圖 13-7)。波浪紋之曲折化現象亦見於大坌坑遺址。波浪紋中稀有案例是 2 件鉢口所飾直式 3 線波浪紋，由直式波浪紋接直線紋連續排列而成圖案區塊(圖 13-6)，紋飾密集而精確，營造繁複華麗之感，有其特殊風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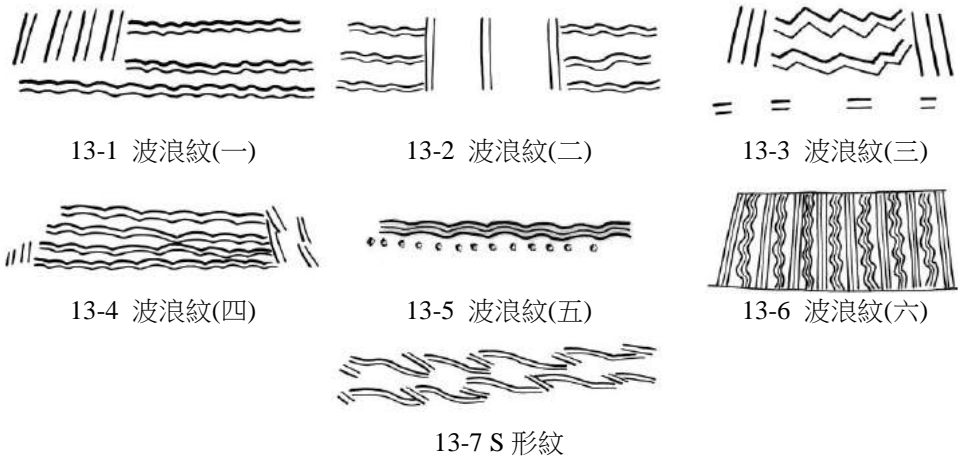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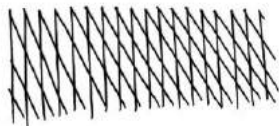


圖 13 芝山岩遺址弧線系圖案

(三) 其他遺址案例

除上述遺址外，其他案例如莊厝遺址出土之鉢口(劉益昌 1997：73)裝飾 1 線至 4 線橫式曲折紋，腹片飾 3 線橫式曲折形梯紋(同上：封面)，長線內夾線條為順向短直線，施作精準而優美(圖 14-5)；水碓尾遺址出土之帶脊盤口罐(同上：76)飾橫式波浪紋接 3 線直紋圖案(類似圖 13-4)。另淡水下罟坑遺址亦曾出土許多大坵坑文化陶片裝飾橫式短紋、交叉菱格網紋、橫式曲折紋加飾圈印紋，以及梯紋等圖例(圖 14：1-4)，並有少量波浪紋(趙金勇 2012)。



14-1 下罟坑遺址交叉菱格紋
(趙金勇 2012 圖版 1)



14-2 下罟坑遺址曲折紋
(趙金勇 2012 圖版 4)



14-3 下罟坑遺址梯紋
(趙金勇 2012 圖版 1)



14-4 下罟坑遺址梯紋
(趙金勇 2012 圖版 5)



14-5 莊厝遺址曲折式梯紋
(劉益昌 1997 封面)

圖 14 下罟坑遺址及莊厝遺址圖案

綜合而言，北部遺址多直線系圖案，弧線系以小波浪紋為主，芝山岩遺址陶片飾 S 形紋為北部遺址少見案例。波浪紋圖案中直式多線波浪紋為少見圖案，其施紋巧妙而繁複似可作為溯源指標圖案，例如在花蓮港口遺址亦曾出土「2 道直式 3 線波浪紋右接橫式 2 線波浪紋」案例(葉美珍 2014)，該波浪紋並未緊密銜接直線紋，圖案空白處較多，精美程度遠不如芝山岩遺址標本，然由此或可證實港口遺址直式波浪紋並非新創而是有其淵源。

除直式多線波浪紋外，芝山岩遺址尚有其他 3 種少見紋飾，包含亦見於大坵坑遺址之 2 線曲折紋「个」形變化型，以及單線交錯人字紋、單線菱格紋。這些少見紋飾可能具時間性或特殊文化意義，或可成為文化溯源時之指標證據。

五、南部地區標本及紋飾案例



圖 15 南部遺址位置圖

南部地區遺址案例依行政區分別為臺南網寮遺址、八甲遺址；高雄新園遺址、六合遺址、孔宅遺址等，但是因為各遺址案例數量差異較大，故介紹之順序按照案例數量排序，最後並加入高雄鳳鼻頭遺址之已知紋飾案例。

(一) 高雄市六合遺址

六合遺址¹³位高雄小港區鳳山丘陵西側緩坡，88 號快速道路南方，高程 30m。1997 年筆者與同事因 88 號快速道路工程而執行地表調查、試掘及搶救發掘等考古工作(陳義一、李坤修、葉美珍 1998)。

¹³ 六合遺址位 88 號快速道路基地，於環評階段之調查中被發現。

六合遺址位高雄女子監獄後方，當時地表景觀為公墓及鳳梨田，於鳳梨園與公墓附近翻開土堆中可見大坵坑文化陶片。六合遺址探坑發掘面積 39 m²，探坑最深者可至 495cm，然 300cm 處仍可見現代建築棄土，出土陶片包括大坵坑文化、牛稠子文化繩紋陶片及素面陶片，三階段陶片錯雜分布，顯示遭嚴重擾亂之二次堆積現象。

本遺址大坵坑文化刻劃紋陶片出自地表及探坑發掘，探坑出土陶片明顯受翻擾而顯細碎、器表剝落或滾磨嚴重，地表採集之部分標本器表特徵保存較好，這些陶片雖因二次堆積之故，無法提供對於時間順序之證據，然保存刻劃紋之各型口緣可作為南部大坵坑文化陶器類型代表。

1、標本簡介

本遺址典型特徵器形或帶刻劃紋之陶片計 68 片，器形部位包括罐口緣 48 片、鉢口 1 片、折肩 9 片及腹片 10 片。陶片呈淡橙色至橙色系，未燒透胎色呈灰至黑灰，胎土摻密集粗砂或泥質皆屬少數，一般多摻稀疏可見砂。

以其中器形確定且紋飾清晰之 18 片陶片為例，均屬陶罐部位，器形包括罐形器口緣 16 件，含盤口、直口及敞口類型，其他為折肩、腹片各 1 片。

(1) 盤口

以斂盤口為主，其中 7 件斂盤口緣可復原口徑介於 13.5cm 至 17.3cm 間，口緣外側施紋帶寬介於 2 至 3cm 間，每一盤口因內部凹折角度與外部突脊高低不同，頗富變化。

第一件口緣外飾單線菱格紋，因格線交錯不工整而使菱格大小不一致。唇面寬 1cm，飾短線紋(圖 16-1、圖版 25)。第二件標本圖案簡化，飾 3 線斜短紋，錯落分布(圖 16-2)。第三件¹⁴飾較大之斜立 2 線 S 紋，紋飾不甚典型，線條較同型紋雜亂，短線與長弧線相對位置不精確，圖案連接處亦有錯紋，整體似趨 S 紋之變化形。其施作雖不夠精美，但斜立的紋飾頗具流動之感(圖 16-3)。

第四件飾 3 列 2 線斜短紋，斜紋自由錯落分布，其排列雖錯雜，不過圖案似亦可表現動態感(圖 16-4、圖版 26)。

¹⁴ 此標本展示於本館臺灣史前史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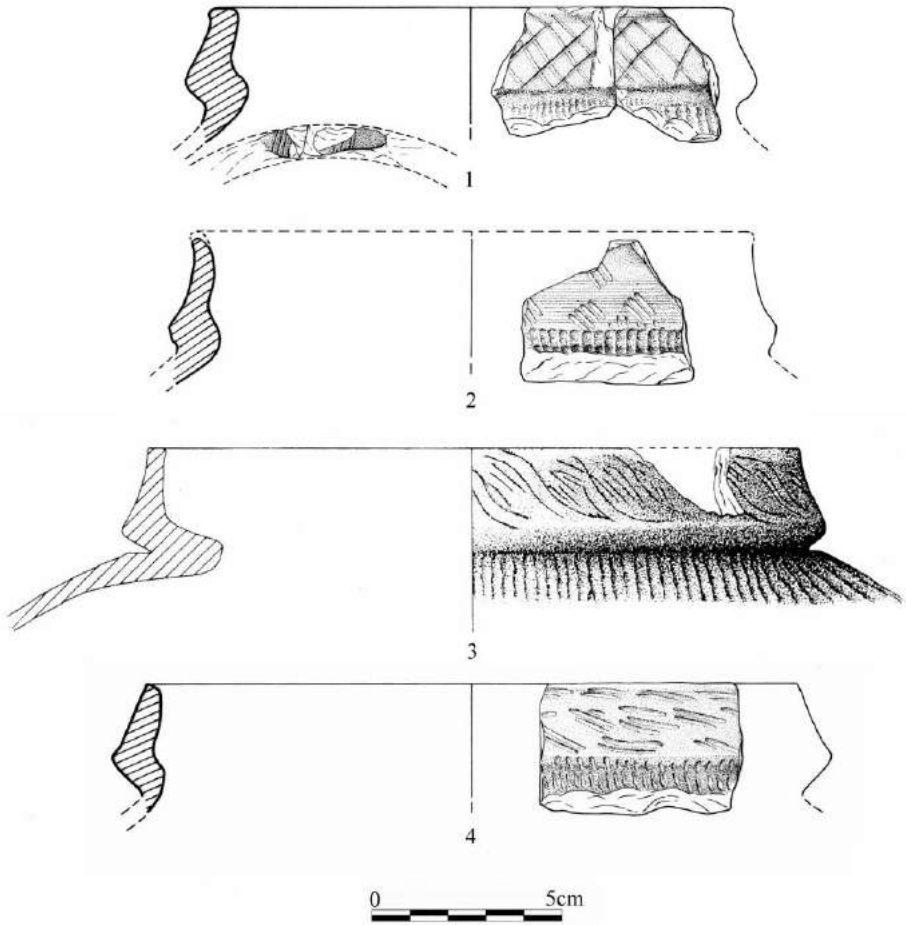


圖 16 六合遺址 4 件斂盤口罐口緣

第五件飾橫式 2 線 S 形紋，連接處未省略短線，屬於「繁複」類型。3 列紋飾滿施口緣，然因空間限制，最下 1 列之圖案並不完整，因此僅約 2.5 列圖案。S 形之長線拱弧狀，使得圖案有如描繪朵朵浪花(圖 17-1、圖版 27)，頗具動態。

第六件口緣飾 3 道 2 線短直紋，因器表破損，約略看出短直紋以高低錯落產生變化(圖 17-2、圖版 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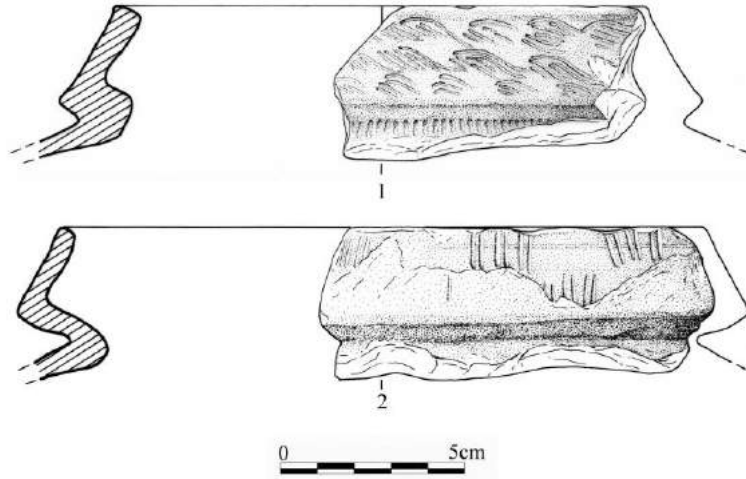


圖 17 六合遺址 2 件斂盤口罐口緣

第七件口緣斂折不明顯且位置較高，形成之施紋面寬僅 1cm，施 6 線直紋，其直線紋頗類似細繩紋(圖 18、圖版 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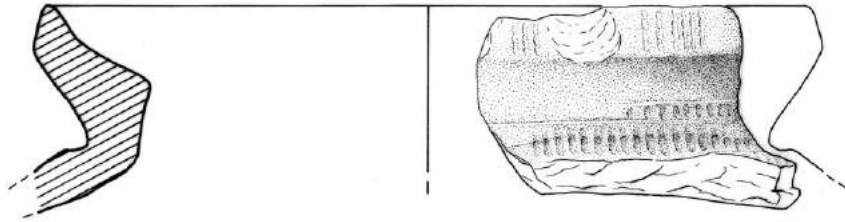


圖 18 六合遺址斂盤口罐口緣

(2) 直口

3 件直口帶沿罐形器口緣。第一件為直口帶小翻沿，口緣高 2.5cm，沿寬 1.2cm，近頸線處帶不明顯突脊，口緣外面飾 3 線橫式開口曲折紋(圖版 31)。

第二件口緣為短直口帶外平沿，沿寬約 2.2cm，施 4 線短紋，略成行而稍呈傾斜狀，頸線以下施 4 線交叉紋，具編織紋美感，交叉線紋清

晰而精確(圖 20-1、圖版 32)。第三件為直口帶外翻沿，頸部帶低矮突脊，口緣外側裝飾 3 線短直線，相同器型亦見於孔宅遺址(圖 28-1)

(3) 敞口

敞口罐口緣 6 件，可復原口徑者 2 件，口徑分別為 18cm、23.8cm。第一件敞口角度小而寬唇，唇寬 1cm，唇線飾凹刻紋，唇面飾 2 線橫短紋，口緣外側飾 2 線斜紋間隔分布(圖 19-1、圖版 33)。第二件敞口罐屬開敞角度大者，口緣面略弧突，寬 3.3cm，裝飾直式 2 線梯紋，至少 4 道併聯，長線內夾之短線由左向右斜，紋飾相當工整(圖 19-2、圖版 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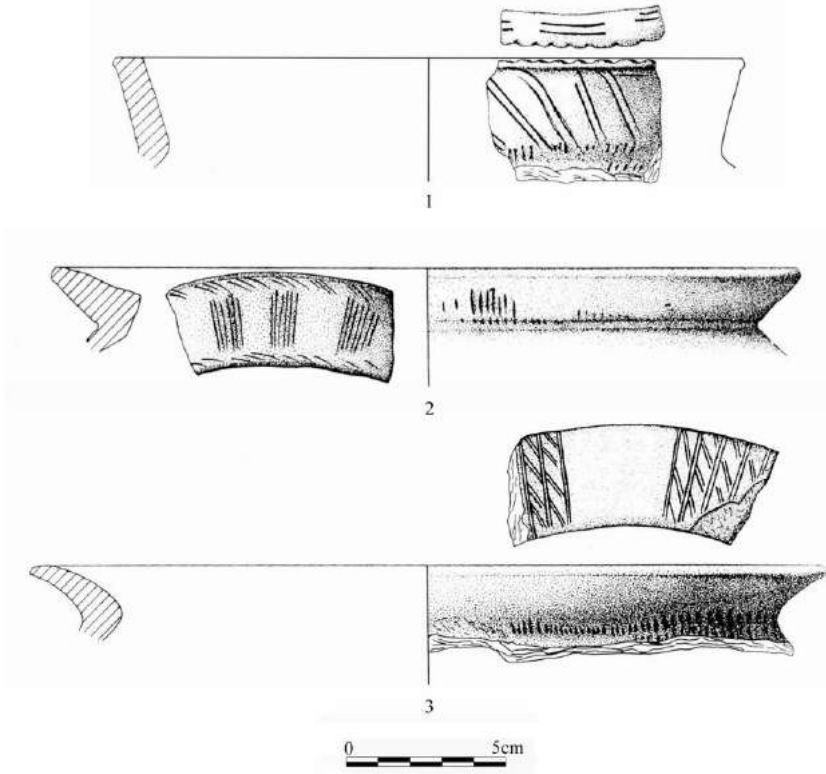


圖 19 六合遺址敞口罐口緣

無法復原口徑標本 4 件，其中 2 件裝飾類似圖案。第一件敞口罐，口緣面寬 2.8cm，6 線直紋居中，上下各以右斜線襯托(圖 20-2、圖版 35)。第 2 件敞口罐，口緣面寬 2cm，3 線直紋上下各接 3 線左斜紋(圖 20-3、圖版 36)。

第三件口緣唇寬而平，有如平頂，頂面寬 1cm，口緣面略內凹，平唇面與口緣內面均飾橫式多線曲折紋，其中口緣面飾 4 線紋，口緣唇面飾 5 線紋(圖 20-4、圖版 37)。第四件口緣其頸線以下部位佚失，推測外敞角度大，口緣寬 3.7cm，口緣唇平坦，寬約 8mm。口緣面施 2 列橫式 S 形紋，紋飾之短直線施作深刻，長弧線略折化，連接處省略 1 道短紋(圖版 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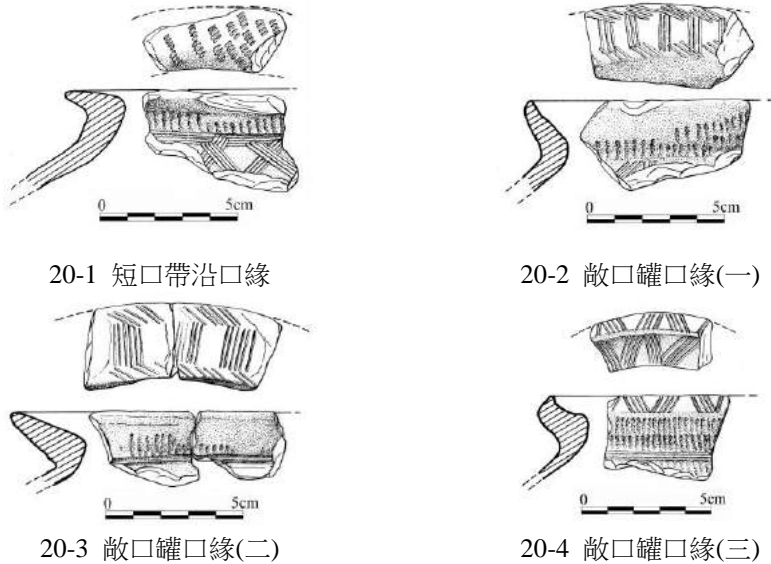


圖 20 帶沿短口及敞口罐口緣

(4) 折肩及腹片

折肩片殘損程度高，裝飾 3 線梯紋，長線內夾右斜短線(圖版 39)。腹片係頸線以下部位，裝飾 2 道 3 線直紋，屬基本紋飾(圖版 40)。

2、紋飾分析

(1) 直線系圖案

本遺址之直線系圖案包括直線紋、曲折紋、交叉紋、梯紋等類。直線紋包含 1 至 5 線橫、直、斜式長短紋之單純紋飾表現(圖 21：1-9)，以及複合式如 3 線直紋接 3 線橫紋(圖 21：10)；3 線直紋上下各接 3 線斜

紋等(圖 21：11)。橫式曲折紋含 4 線至 5 線採上下開口之單純紋飾，以及 5 線曲折紋與 5 線橫紋複合圖案(圖 21：16-18)。交叉紋圖案主為單線菱(方)格網，案例施作較為紊亂不均，其他 3 線至 5 線等多線交叉紋已接近籠目紋或編織紋之感(圖版 29、圖 21：12-15)。梯紋類包含常見之 2 線併排梯紋，其中有 2 個案例，為少見之橫式梯紋，圖案表現出繩梯之感(圖 21：19、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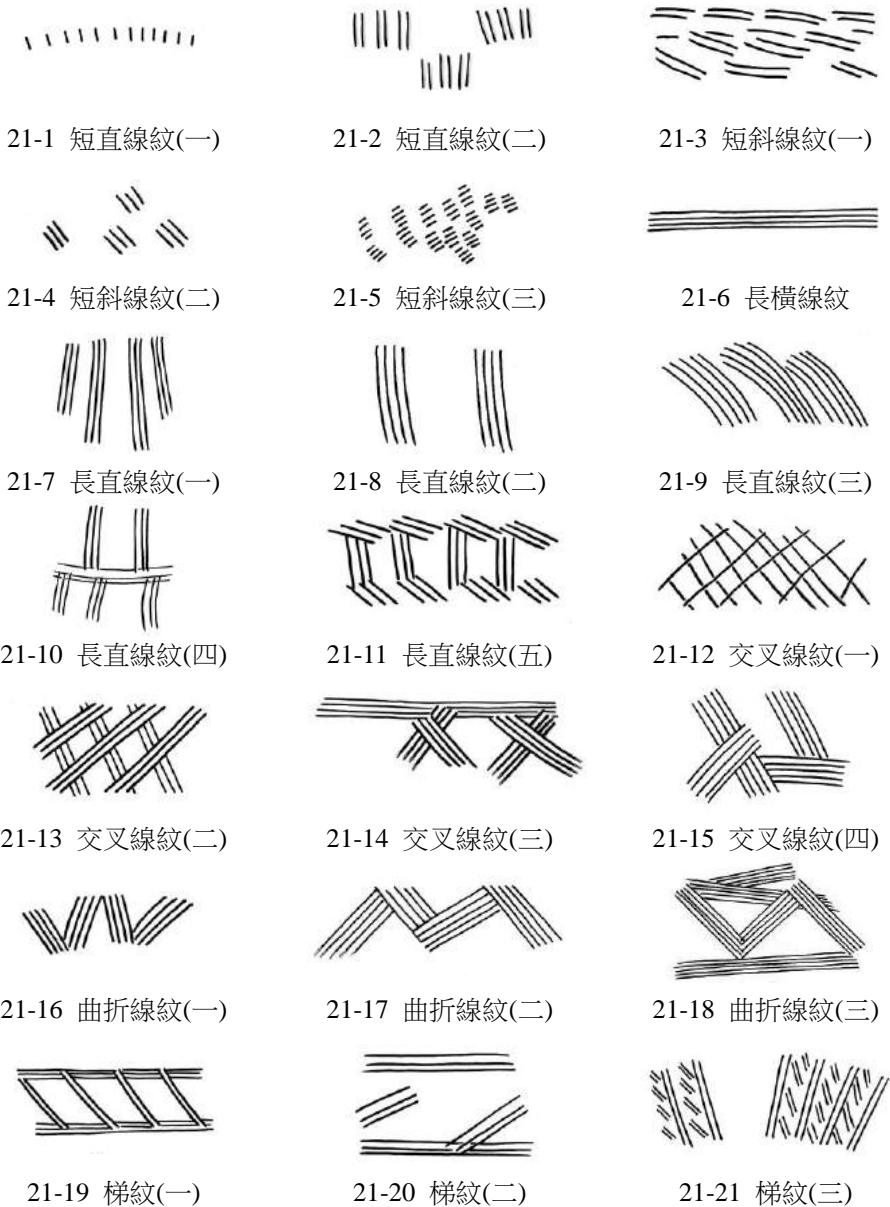


圖 21 六合遺址直線系圖案

(2) 弧線系圖案

弧線系主為 S 紋，含 2 線及 3 線 S 紋，橫式及斜立式皆有，斜立式可表現出動態感，尤其一例 S 紋變化型，似表現出層層大小浪花，頗具浪潮動感(圖 2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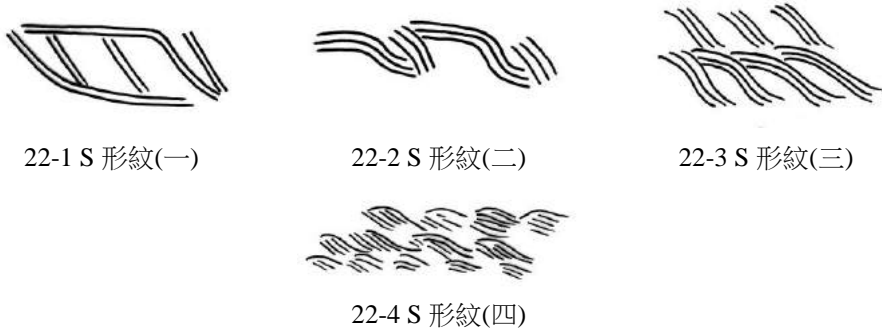


圖 22 六合遺址弧線系圖案

綜觀上述圖案之施作除表現靜態線條形象外，似亦有表現動態之意象，這在直線系及弧線系皆可看到其中隱含的動感。

(二) 高雄市孔宅遺址

孔宅遺址位六合遺址南方 900m 處，與六合遺址間隔大片墓園。1997 年發掘面積 21 m²，發掘坑內未保存原始文化層。探坑出土陶片保存狀況與六合遺址類似，然陶片更為稀少，保存狀況較好之刻劃紋陶片亦多出自地表採集。

1、標本簡介

本文觀察孔宅遺址刻劃紋陶片 64 片，器形部位包括罐口緣 46 片、鉢口 2 片、折肩 13 片及腹片 3 片。陶片呈淡橙色至橙色系，未燒透胎色呈灰至黑灰，胎土含砂程度由稀疏至密集均有，摻多砂標本屬少數，一般多摻稀疏可見砂，少數器表殘存紅彩。

擇其中器形與紋飾保存較好之 18 片陶片為例，復原器形包括 15 件罐口、2 件鉢口以及 1 件陶罐折肩。

(1) 罐形器

陶罐相關標本分別為 6 件盤口罐口緣、3 件直口罐口緣、6 件敞口

罐口緣及 1 片折肩部位。

(i) 盤口

6 件盤口罐包含 4 件斂盤口及 2 件直盤口。6 件盤口復原口徑介於 14cm 至 21cm 間。第一件斂盤口¹⁵外側面寬 3cm，施單列橫式 2 線 S 形紋，長線弧轉角度均勻，紋飾連接處省略 1 道短線，屬於施作優良之大型 S 形紋案例，簡潔而具流動美感(圖 23-1)。

第二件罐口外側面寬 2.7cm，圖案面殘損，施作間距較大之 2 線右斜短紋，其線條單純，局部施作稍顯紊亂(圖 23-2)。第三件罐口外側面寬 2.7cm，圖案面殘損，隱約辨識為 5 線直紋接 5 線橫紋之圖案，但有局部修改為斜紋之現象(圖 23-3)。第四件罐口外側面寬 3.1cm，滿施 2 列橫式 2 線 S 形紋，長弧線略折線化，紋飾連接處未省略 1 道短線，圖案較顯繁複(圖 23-4、圖版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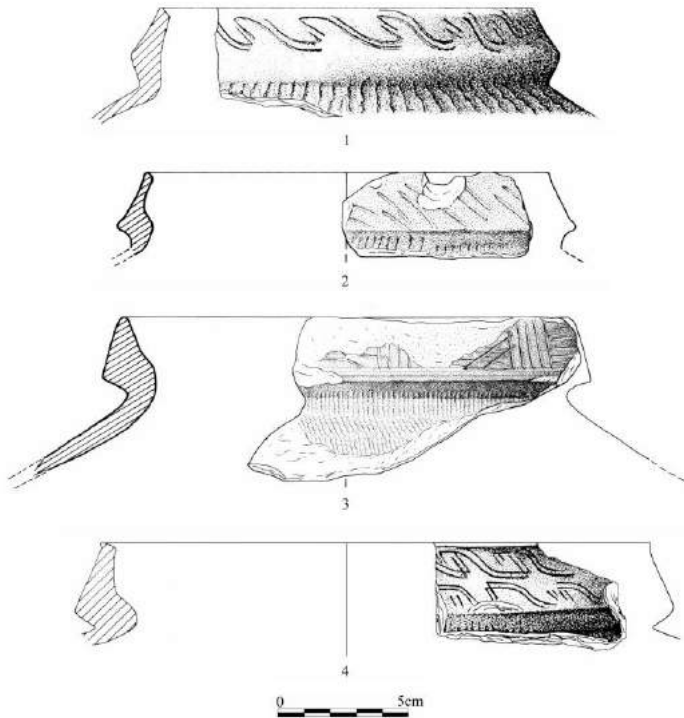


圖 23 孔宅遺址 4 件斂盤口罐口緣

¹⁵ 此標本展示於本館臺灣史前史廳。

第五件及第六件為直盤口，第五件外側寬 2.3cm，施單列 2 線交叉紋，圖案上端局部磨損以致略微模糊(圖 24-1、圖版 42)。第六件罐口外側面寬 2.5cm，圖案面殘損仍可辨識其滿施 2 列橫式 2 線 S 形紋，部份線條深印而清晰，個別圖案線條弧度頗為精美，圖形之短線超過長弧線高度，交接處省略 1 短線，弧線條稍顯折線化，但在整體布局中，有些圖案大小不勻且線條弧度失誤(圖 24-2、圖版 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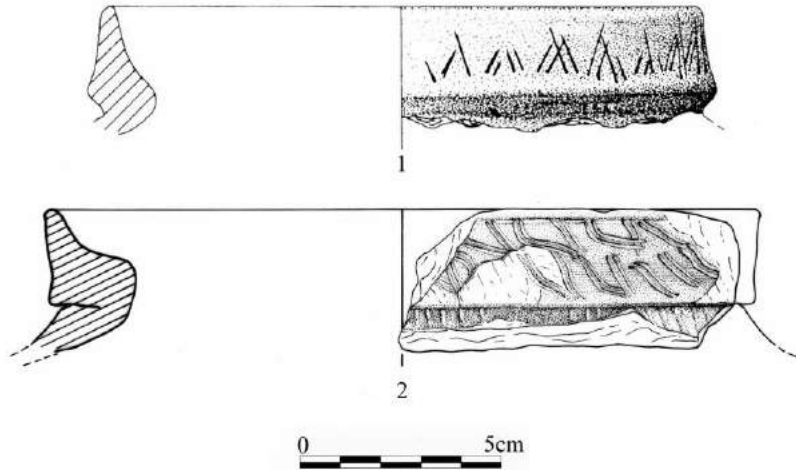


圖 24 孔宅遺址盤口罐口緣

(ii) 直口

3 件直口罐形器短口緣，依其口緣唇面寬度變化分為 3 個次類型。2 件可復原口徑約 15cm 及 20cm(含口緣斜領)。第一件短直口施 3 線直紋，在其寬近 1cm 之口緣頂面亦施同樣 3 線直紋(圖 25-1)。第二件為短直口帶斜領，於寬 2cm 之斜領施紋，紋飾已殘損模糊，仍可辨識並復原為橫式 6 線曲折紋(圖 25-2、圖版 44)。

第三件為直口帶外翻沿，未能復原口徑，口高約 2cm，施紋面寬約等同口高。頸部帶低脊，口緣頂端略為外翻，施 4 線直紋(圖 28-1、圖版 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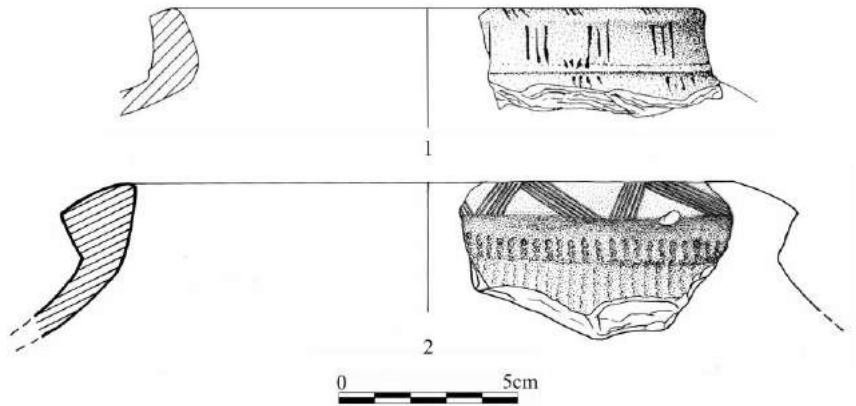


圖 25 孔宅遺址短直口罐

(iii) 敞口

6 件敞口罐形器口緣中有 3 件可復原口徑，1 件標本近直口而略微外敞，復原口徑 12.8cm，另外 2 件陶罐外敞角度大，復原口徑各為 22cm 及 23.4cm。第一件標本施紋面寬 2.5cm，施單列 2 線橫式曲折紋(圖 26-1、圖版 46)。第二件標本口緣面平直，施紋面寬約 3.4cm，滿施錯落之單線長、短斜紋，效果有如風中雨絲(圖 26-2、圖版 47)。第三件標本口緣面略為凹弧，面寬約 3cm，施有 2 列紋飾，上列紋飾為 S 形紋，長弧線下段略折線化，S 紋交接處未省略短線，下列紋飾為 6 線直細紋，其唇寬近 1cm，在此狹小空間內亦飾有 S 形紋，長線間省略 1 道短線(圖 26-3、圖版 48)。此標本紋飾深刻，布局均勻，具工整美感。

未復原口徑之 3 件標本中，第一件標本裝飾並排梯紋，單長線內夾 2 線右斜短線，其長線與內夾短線條數量不一致，屬於少見之案例(圖版 50)。第二件標本為平唇敞口罐，口緣面殘損，寬 2.8cm，裝飾圖案為 2 線直線，間隔 1cm 左右連續分布，上下各接一列 2 線 S 形紋，S 形紋簡化為長弧線，下列 S 形紋體型較上列 S 紋大，因此在兩道直線間距中，上端分布 3 個 S 紋，下端分布 2 個 S 紋，上下兩列 S 紋簡化有如短弧線密集連接，中間直線處顯得留白較多(圖 30-5、圖版 51)。

第三件為少見之窄沿罐，頸線以下腹部膨大，胎壁平直，所帶紋飾亦屬稀有案例。口緣面稍內凹，頸線下施 2 道 3 線直紋，內夾 3 線左斜短紋與右斜短紋交叉有如辮結紋，直施於繩紋之上，暫列梯紋之變化型(圖 27、圖版 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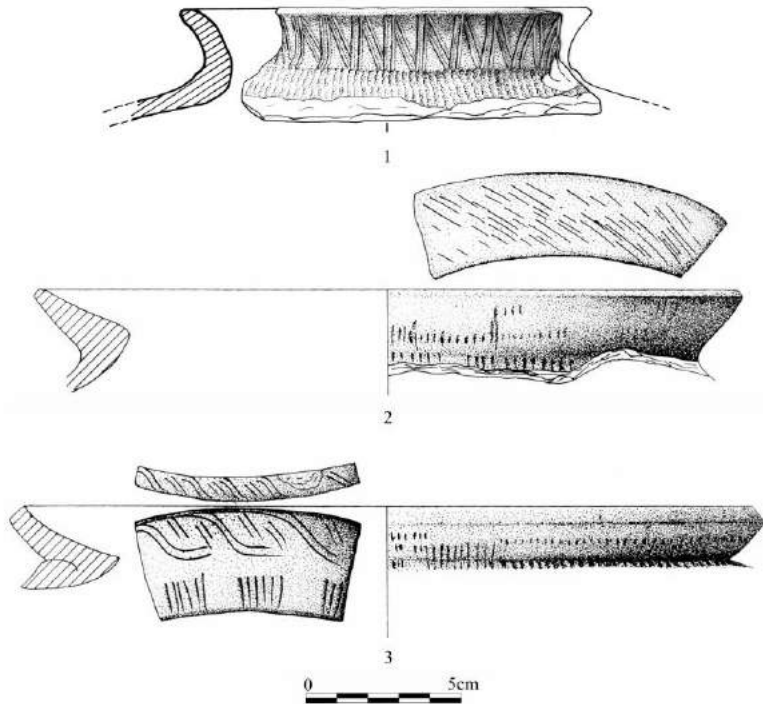


圖 26 孔宅遺址敞口罐口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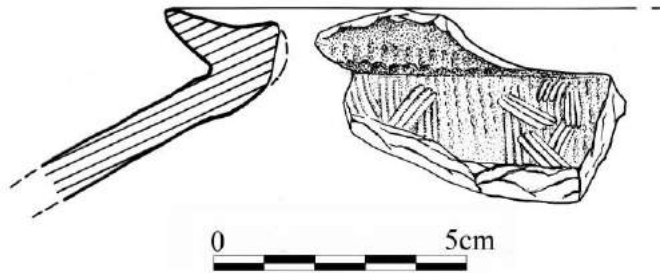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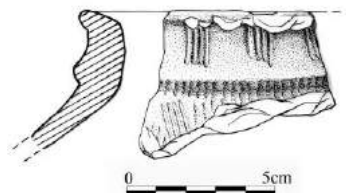
圖 27 孔宅遺址窄沿敞口罐

(iv) 折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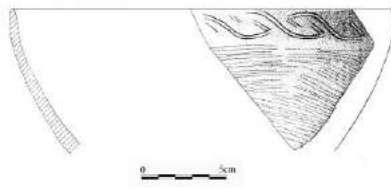
折肩片紋飾相當清晰，施 3 線梯紋，長線內夾左斜短線，長短線緊密銜接，形成整齊均勻之圖案(圖 28-3、圖版 52)。

(2) 鉢形器

2 件鉢口體積差異頗大，大者復原口徑約 20cm(圖 28-2、圖版 53)，口部稍斂，小者口端之下稍斂縮而形成削腹器形(圖 28-4、圖版 54)。2 件標本均飾單列橫式 2 線 S 形紋，長弧線施作流暢，圖案大而線條勻稱，紋飾連接處未省略 1 道短線，尤其較大鉢口 S 紋之弧線加長，如此一來雖未省略短線而圖案卻不顯擁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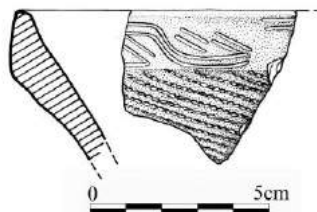
28-1 直口帶沿罐



28-2 鉢形器(一)



28-3 折肩



28-4 鉢形器(二)

圖 28 孔宅遺址短直口罐、鉢及折肩

2、紋飾分析

(1) 直線系圖案

本遺址直線系圖案包含直線紋、曲折紋、梯紋，直線紋為單線至多線之橫、斜、直紋，最複雜圖案為 5 線直紋接 6 線橫紋連續施作，橫線條亦作為圖案帶之區隔線(圖 29：1-5)。

曲折紋含 2 線及 6 線 2 個圖例(圖 29：6-7)。梯紋包含 1 至 4 線等 6 個圖例，梯紋甚少見到 1 線案例，唯一案例為 1 線長紋，內夾右斜 2 線短紋。2 線至 4 線梯紋施作均精準，尤其 3 直線夾 3 線左斜短紋圖案其下端以橫線區隔，屬於製作最精確之梯紋案例。第六個圖例直線內結合左斜及右斜短線，形成略似辮結狀，屬特殊案例(圖 29：8-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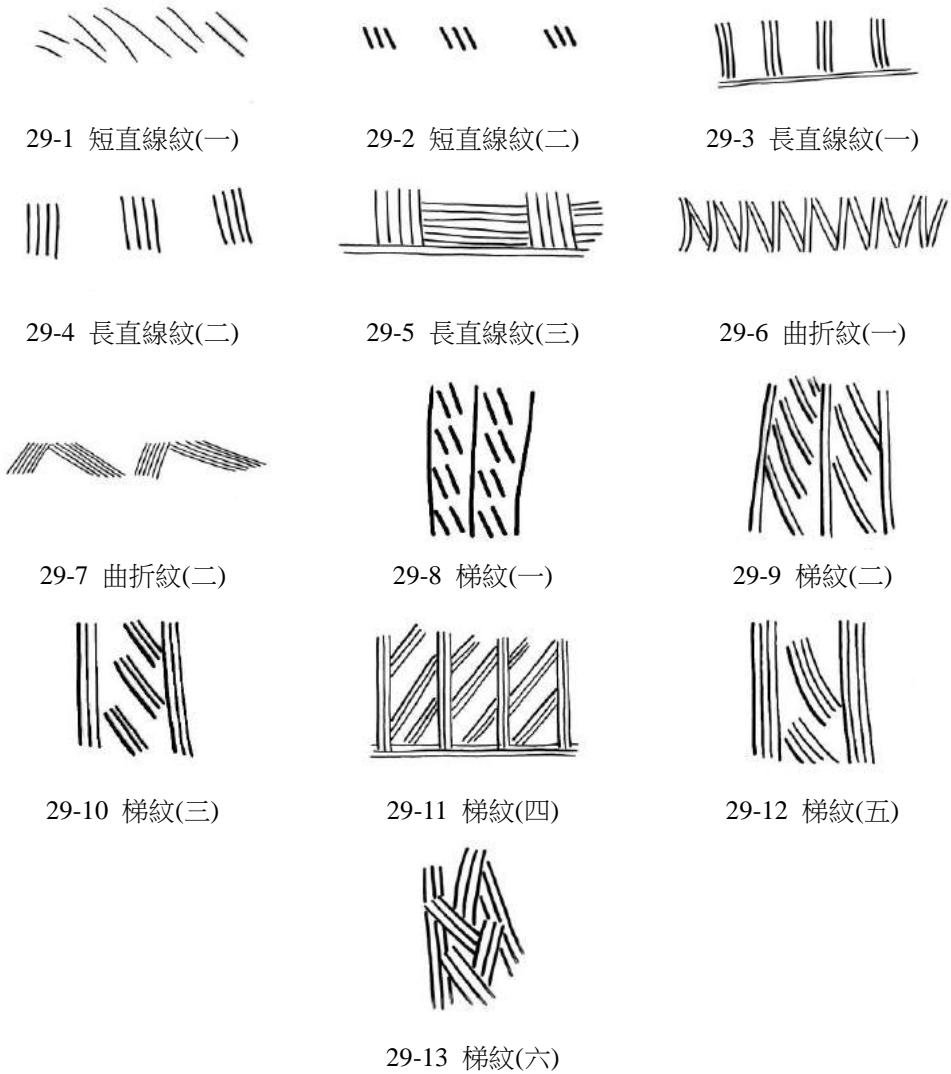


圖 29 孔宅遺址直線系圖案

(1) 弧線系圖案

弧線系圖案主為 2 線 S 形紋，前述 13 件陶器中即有 6 件飾 S 紋，顯見其比重。紋飾可見精美優良之施作案例，形式包含橫式及斜立 S 紋，前者表現弧線之美，後者稍具動態之感(圖 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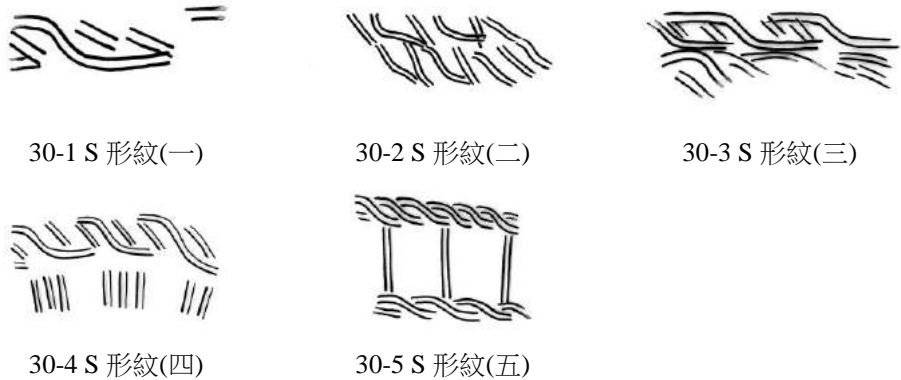


圖 30 孔宅遺址弧線系圖案

(三) 臺南市八甲遺址

八甲遺址位臺南市歸仁區八甲里北側，鹽水溪支流許縣溪中游，高程 21m(黃士強 1974)。

1、標本簡介

觀察館藏八甲遺址刻劃紋陶片 12 片¹⁶，包括罐口 6 片、鉢口 2 片、折肩 3 片及腹片 1 片。陶片保存狀況良好，呈淡橙色至橙色系，未燒透胎色呈黑灰，胎土含稀疏可見砂，胎壁結實。以其中 10 件標本作為代表。

(1) 罐形器

(i) 敞口

6 件罐形器口緣標本均為敞口罐，口緣內面平直或略呈弧狀，可復原口徑者 5 件，介於 12.5cm 至 25cm 間。紋飾分布於口緣面，線條清晰。口徑自小而大，第一件陶罐口緣面寬 1.8cm，滿施 2 線直式 S 紋，S 形狀分解為 2 短線中夾 1 長弧線，弧線已折線化，且線條不均勻(圖 31-1)。第二件口緣面寬 2.2cm，施 3 線橫式曲折紋，2 列曲折紋滿施於口緣面，曲折布局略有不均之處(圖 31-2、圖版 55)。第三件口緣寬 2cm，2 道 2 線橫式波浪紋間隔以 2 線直紋，滿施於口緣面(圖 31-3、圖版 56)。

¹⁶ 12 片陶片中鉢口緣及腹片各 1 片陳列於本館臺灣史前史廳。

第四件口緣面寬 2.7cm，2 列 2 線橫式 S 紋連續滿施，S 形連接處省略 1 道短線，屬連續 S 紋之「簡潔型」。此一口緣唇面並帶切刻紋(圖 31-4)。第五件陶罐體積最大，口緣面寬 3.7cm，削唇面帶 2 線短橫紋，口緣面施直式 2 線梯紋，2 道梯紋併排，長線內夾短線僅略右斜，部分線條趨近直線，長度不一(圖 31-5、圖版 57)。

第六件口緣無法復原口徑，面寬 2.7cm，紋飾為單列 2 線橫式 S 紋，亦屬連續 S 紋之「簡潔型」，紋飾較大，口緣外側帶波浪堆紋(圖 32-1、圖版 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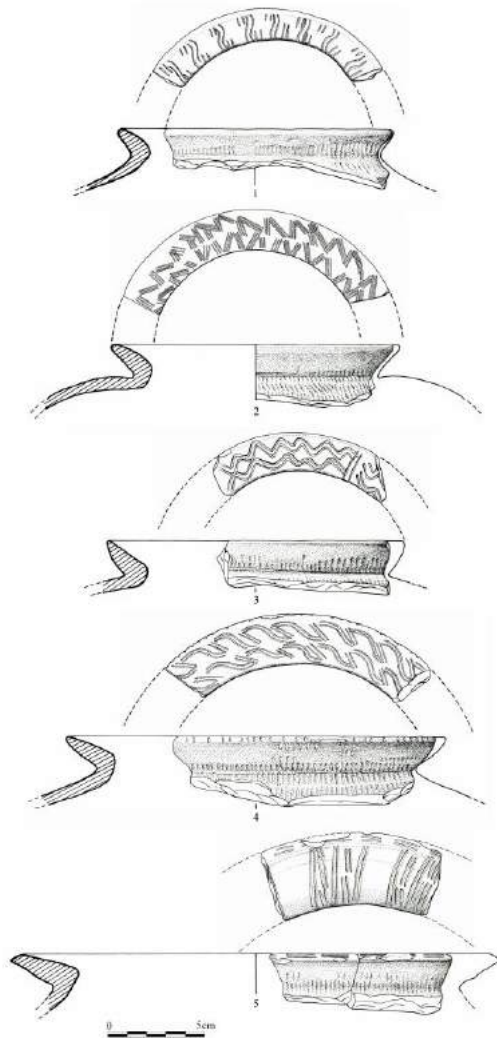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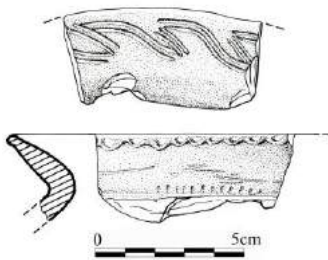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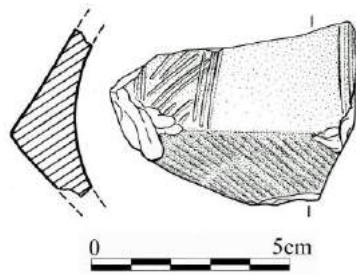
圖 31 八甲遺址敞口罐口緣

(ii) 折肩及腹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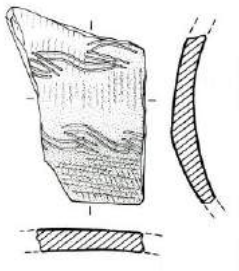
罐形器相關部位包含 3 片折肩及 1 片腹片。折肩片中僅 1 件肩線加厚且折曲角度較明顯，飾 3 線梯紋，內夾左斜短線(圖 32-2)，其他 2 片胎壁相對均勻而僅略帶折曲度，肩線較不明顯，一飾 2 線梯紋，長線內夾右斜短線¹⁷，一在繩紋抹平後施 2 線橫式 S 紋，2 列 S 紋分布於上腹部(圖 32-3)。腹片為頸線以下部位，所施紋飾為 2 線長岔紋與長線之組合，部份紋飾略似拉長之人字紋(圖 32-4、圖版 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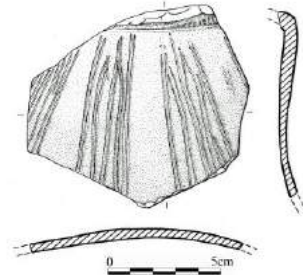
32-1 敞口罐口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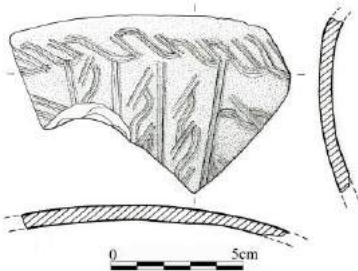
32-2 折肩(一)



32-3 折肩(二)



32-4 腹片



32-5 鉢形器腹片

圖 32 八甲遺址敞口罐口緣、腹片、折肩

¹⁷ 此標本展示於本館臺灣史前史廳。

(2) 鉢形器

鉢形器標本 2 件，1 件為斂口鉢，唇面帶切刻紋，鉢口所飾橫式 S 紋類同於前述 2 件罐口，S 紋長線略折線化¹⁸。第二件為陶鉢腹片，裝飾橫式與直式 2 線 S 紋組合圖案(圖 32-5、圖版 60)。圖案帶包含二部分，一為主圖案，由 4 道 2 線直線區隔出 3 道長槽空間，內部施滿直式連續 S 形紋，此圖案兩側連接風格類似之橫式連續 S 紋，S 紋之兩端短線比較長，由左斜短紋加上長弧線成為 S 紋。

此圖案特別之處是，其短線與長弧線之相對位置顯示，此圖案似由梯紋改形而成，在長線內夾之短斜線間加弧線即成直式連續 S 紋。第二部份在主圖案之上端，有一列橫式 S 紋，其短線與弧線比例顯得較為正常。此一圖案組合頗為複雜，屬特殊案例。

上述陶罐標本中雖未見斂盤口罐類型，然昔日八甲遺址亦曾出土數件斂盤口陶片，紋飾圖案與上述多有類同(黃士強 1974)，以下於紋飾一節中綜合敘述。

2、紋飾分析

綜合上述陶片紋飾以及已發表案例，八甲遺址刻劃紋所含直線系及弧線系如下。

(1) 直線系圖案

直線系含直線紋、交叉紋、曲折紋、梯紋。直線紋案例為 8 條直線成 1 組區塊，裝飾口緣面(圖 33-1)。交叉紋含單線及 2 線交叉紋(圖 33：4、5)。另有長直線與「人」字形長線複合圖案(圖 33-2)，以及 2 線扇骨狀紋飾(圖 33-3)。曲折紋為 2 列 3 線橫式曲折紋滿施於口緣面(圖 33-6)。梯紋含 2 線及 4 線案例(圖 33：7、8)，2 線案例為 2 道梯紋拼接，內部短線直或稍斜，4 線案例線條多且至少 6 道拼接，形成繁複之感。

¹⁸ 此標本展示於本館臺灣史前史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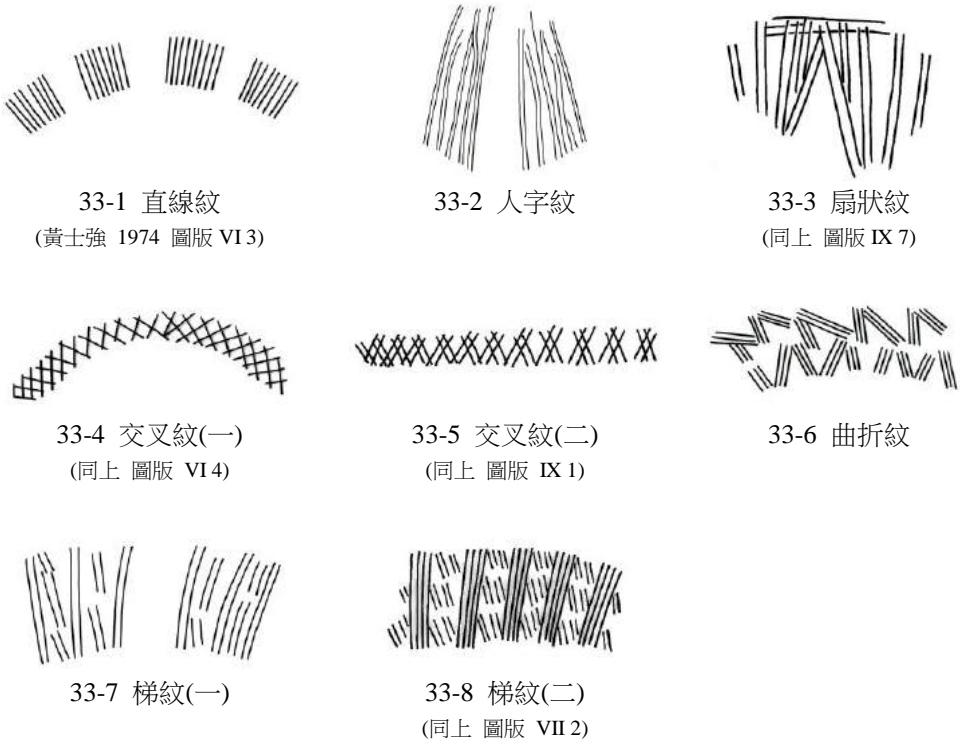


圖 33 八甲遺址直線系圖案

(2) 弧線系圖案

弧線系包括 2 例波浪紋，其他為 S 形紋。一波浪紋案例為 2 線橫波浪紋兩側以直線區隔(圖 34-1)。S 形紋含橫式及直式，橫式有 2 線及 3 線案例，直式為 2 線案例。橫式 S 紋常見圖形起自左端，在此則有一例為起自右端之翻轉形式(圖 34-3)。3 線案例施於敞口罐口緣面，圖案連成一氣(圖 34-4)，其唇面並施波浪紋，是為第二例波浪紋。直式 S 紋案例之短線與弧線連結頗為鬆散(圖 34-5)。此外有 2 個 S 紋複合圖案，一是直線與橫線所區隔之空間內施 3 行直式 S 紋(圖 34-6)。另一圖案較複雜，由上下二部分組成，上部是 1 列橫式 S 形紋，下部是 3 行直線內夾直式 S 紋，似由梯紋改形，此圖案區塊左右各接 2 列橫式 S 紋，是為特殊案例(圖 34-7)。



34-1 波浪紋



34-2 S 形紋(一)



34-3 S 形紋(二)

34-4 S 形紋(三)
(同上 圖版 VI 1)

34-5 S 形紋(四)

34-6 S 形紋(五)
(同上 圖版 VII 6)

34-7 S 形紋(六)

圖 34 八甲遺址弧線系圖案

(四) 高雄市新園遺址

新園遺址位於高雄市路竹區，國道 1 號路竹交流道以東，臺 28 線北側臺糖新園農場內，為二仁溪下游支流南側河岸沖積地。

1、標本簡介

2 件陶片標本係於 2008 年地表調查中所採集¹⁹，均為敞口罐口緣。第一件罐口緣，器色淡橙，泥質灰胎，胎土可見砂稀少，胎壁結實，陶器內壁殘留褐色色彩。口緣削唇，口緣面寬 2.5cm，頸下腹壁侈放角度大，屬大腹器型。口緣唇面施切刻紋，口緣面施單道 3 線連續 S 形紋，下接不連續 2 線短橫紋，S 形紋連接處省略 1 道短線，線條頗為流暢，然 3 線間距不均勻。(圖 35、圖版 61)。

第二件為小型罐口緣，口緣面寬僅 2.3cm，器色橙紅，未燒透處呈灰色胎，胎土夾較多 1mm 粒徑以上可見砂。口緣面施 2 道 4 線直紋組成之圖案(圖版 62)。

除以上 2 件敞口罐外，新園遺址亦至少出土 3 件本文所稱斂盤口罐之「凸脊劃紋罐」(顏廷仔 2013：96)，紋飾綜述於下節。

¹⁹ 2008 年筆者與同事李坤修於新園農場附近作調查，李坤修於果園內採集刻印紋陶 2 片，該遺物分布區鄰近曾有工業開發之議，衍生後續考古試掘工作，其中出土大坌坑文化刻印紋陶片等相關史前遺留(顏廷仔 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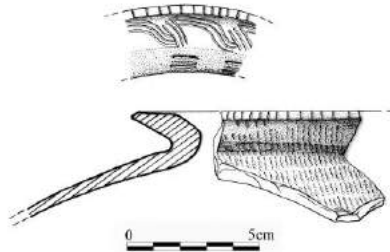


圖 35 新園遺址敞口罐口緣

2、紋飾分析

綜合上述 2 片陶片紋飾及其他已發表案例，新園遺址刻劃紋所含直線系及弧線系圖案如下。

直線系包括直線紋、橫線紋及梯紋。直線及橫線可單獨表現(圖 36：1、2)，亦有長線與短線之複合表現，局部已接近梯紋(圖 36：3、4)。梯紋含 2 線及 3 線案例(圖 36：5、6)。

弧線系為 S 形紋，案例皆為 3 線 S 紋(圖 36：7-9)，第一個圖例似僅表現長弧線部分(圖 36-7)，其他 S 紋施作準確，其中一例在 2 列 S 紋間尚以橫線區隔(圖 3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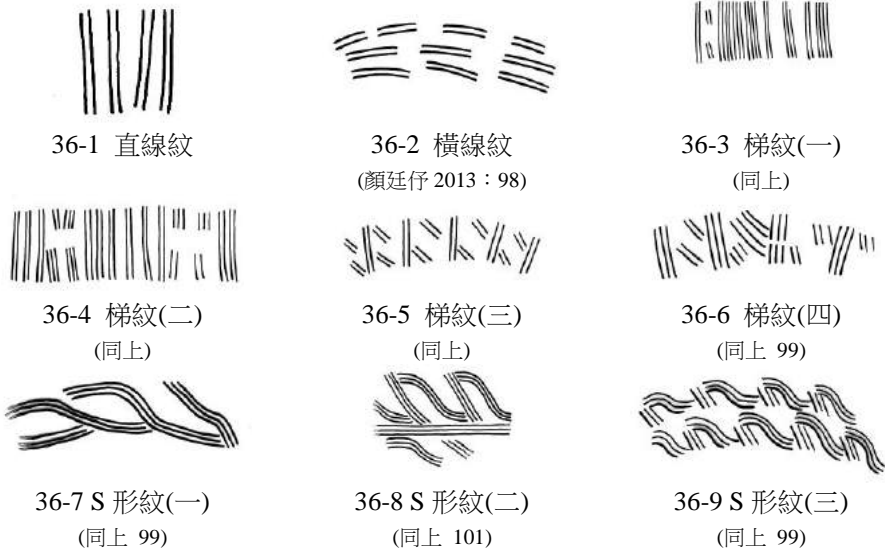


圖 36 新園遺址直線系及弧線系圖案

(五) 臺南市網寮遺址

臺南網寮遺址位於臺南市永康區復國里，興國街北側之永康公園內。郭德鈴先生捐贈該遺址陶片標本中，具大坌坑文化器形特徵者初估至少有 44 片，器形部位包括罐口緣 31 片及折肩片 13 片，罐口緣中屬短口帶外斜領器形者 26 片，其他為突脊不明顯之盤口罐，主要器形如圖 37 及圖版 63 所示。這些陶片均因器表剝蝕而未保存紋飾，但同樣器形在孔宅、六合遺址均可見帶紋飾案例。

網寮遺址長期受到社區開發影響，遺物分布地點逐漸縮減，以致近年陶片標本露出機率低，然最近仍可於公園中採集 1 片保存良好之刻劃紋陶片²⁰，成為本節所計之第 45 件標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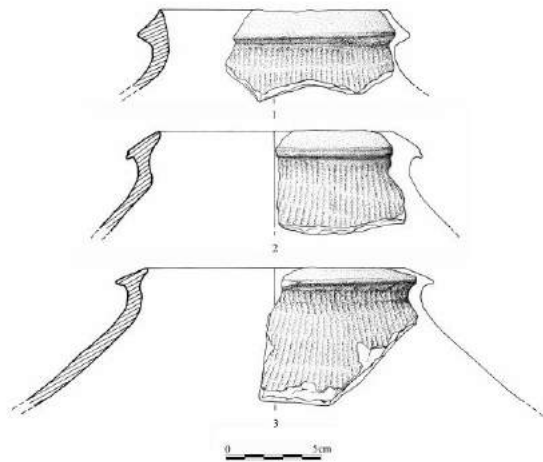


圖 37 網寮遺址帶外斜沿罐口緣

該件標本為敞口罐口緣，口緣面弧形外翻，復原口徑約 18.5cm，器色偏橙紅，灰色泥胎，胎土幾無可見砂，陶質結實。口緣面滿施單道橫式 2 線連續 S 形紋，S 形紋稍微斜立，連接處省略 1 道短線，兩端短線高度偶而超過弧線，線槽之寬窄及深淺較不一致(圖 38、圖版 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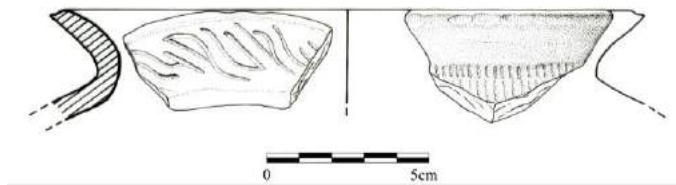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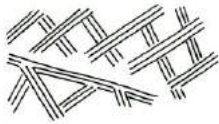
圖 38 網寮遺址敞口罐口緣

²⁰ 此標本為同事李坤修於 2012 年採集。

(六)其他遺址紋飾案例

高雄六合、孔宅、新園遺址及台南八甲、網寮遺址等 5 處遺址陶片紋飾敘述如前面章節，5 處遺址皆出土盤口罐及敞口罐，前 4 處遺址之盤口罐包含突脊特徵明顯之斂盤口罐，網寮遺址則僅有突脊較不明顯之直盤口器形。

此外在此亦納入與六合、孔宅遺址同處鳳山丘陵之鳳鼻頭遺址所出土刻劃紋圖案。早期出土之鳳鼻頭遺址陶片中，可採集 4 個圖案(圖 39)，分別是直線構成之多線交叉紋，介於曲折線與波浪紋間之多線曲折紋，以及 2 線 S 形紋(Chang et.al.1969)。



39-1 交叉紋(一)
(Chang 1969 plate 14D)



39-2 交叉紋(二)
(Chang 1969 plate 14c)



39-3 曲折紋
(Chang 1969 plate 14K)



39-4 S 形紋
(Chang 1969 plate 15K)

圖 39 鳳鼻頭遺址紋飾案例

南部鹽水河流域除前述八甲遺址、網寮遺址外，尚有其他如大昌橋遺址等(朱正宜、楊鳳屏、鍾亦興等 2014：6、22-23)，大昌橋遺址接近八甲遺址，器形及圖案亦與之頗為接近。年代介 4800-4200B.P.間之臺南市南關里東遺址，其刻劃紋圖案組合包括直線系的葉脈紋、曲折紋，弧線系的「几」形紋、小水波紋(李匡悌、臧振華、朱正宜 2013)，其葉脈紋中部分圖案即本文所稱梯紋，而「几」形紋中之部分圖案為本文所稱 S 形紋，小水波紋為本文所提小波浪紋。其 S 形紋大多維持南部地區技術水準，呈現慣有優美弧線，規律而流暢地以帶狀與塊狀分布於陶器之上。

六、中部地區標本及紋飾案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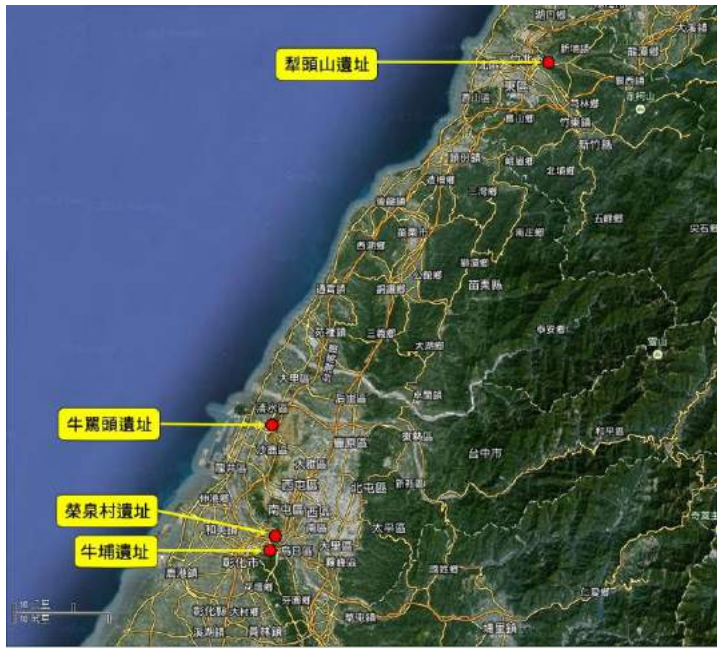


圖 40 中部地區遺址位置

臺中市榮泉村遺址位於烏日區烏溪北岸榮泉社區內，捐贈標本原採集者未詳細註明採集地點，以往亦未被其他研究者記錄。

(一)標本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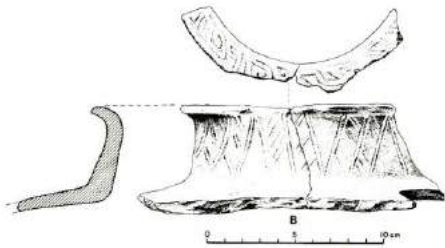
榮泉村遺址僅有 2 片刻劃紋陶片，包括缺口 1 片，飾單列 2 線橫式 S 紋，線條呈現折曲化。第二件標本近似圈足片，器身帶穿，所飾圖案由 2 列 2 線 S 紋下接 2 線直式弧線組成，S 紋亦曲折化，因下半部圖案不全，故未能辨識直式弧線之全貌與其組合²¹(圖 42：5、6)。

(二)其他遺址已知紋飾案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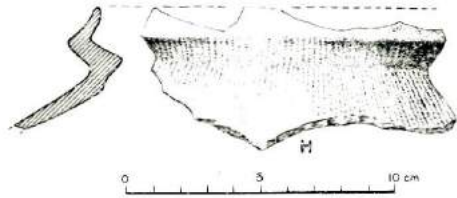
研究者早期於大肚山台地牛罵頭遺址進行地表調查時已採集少量大坵坑文化陶片，其中有飾曲折式梯紋者(何傳坤 1997：59；圖版 VIIA：4-7)，後續於牛罵頭遺址發掘亦出土數片大坵坑文化陶片，包括 1 片帶刻劃紋高頸罐口緣，以及 1 片斂盤罐口緣(Dewar 1977：PL9-10)。

²¹ 因 2 片陳列於本館臺灣史前史廳，暫無法觀察及陳述其他細節。

帶紋飾器形為高直口帶外翻沿，於頸部與翻沿面均作施紋。外頸面飾曲折式梯紋，以 2 線梯紋為主，2 道梯紋合併 1 組，左斜梯紋組接右斜梯紋組，連續施紋形成曲折式梯紋，左斜長直線內夾右斜短紋，形成走向相反之趣味。外翻沿面施 2 線橫式連續 S 形紋，其中弧線略呈直線化，S 形紋連接處省略一道短直線，使得圖案較為簡潔而流暢(圖 41-1)。



41-1 牛罵頭遺址刻印紋陶片
(Dewar 1977 PL10)



41-2 牛罵頭遺址陶罐口緣
(Dewar 1977 PL9)

圖 41 牛罵頭遺址陶罐口緣

另一斂盤口罐形器口緣殘件雖未保存紋飾(圖 41-2)，然如北部、南部章節所見，這類口緣常見口緣外側施紋。

牛埔遺址位彰化市牛埔里臺鳳社區前方平坦台地，八卦山台地東北緣，北臨貓羅溪左岸。牛埔遺址刻劃紋陶片不多，出自試掘坑及私人地表採集皆有之(趙金勇、鍾亦興 1992；郭素秋 2008)。

已知帶刻劃紋陶器 4 例皆為敞口罐，刻劃紋施於口緣面，4 例為直線紋及梯紋之表現(圖 42：1-4)。1 例為 3 個直式短紋連接形成 1 道直式虛線，以 4 道直虛線為基本圖案，間隔施於口緣面(趙金勇、鍾亦興 1992：60)。第二例保存 2 道直式雙線梯紋，梯紋併連，2 道梯紋長直線內夾斜橫線，其中一道直線內夾 4 道橫線，橫線緊接直線，間距尚稱平均，頗近似「梯」之形狀，併連之左側長線內夾 3 道橫線，橫線未緊接長線且間距不均衡。

第三例保存 3 道直式 2 線梯紋，梯紋併連，兩直線內夾 2 道左斜橫紋，第四例梯紋併連直線內夾右斜短線(郭素秋 2008：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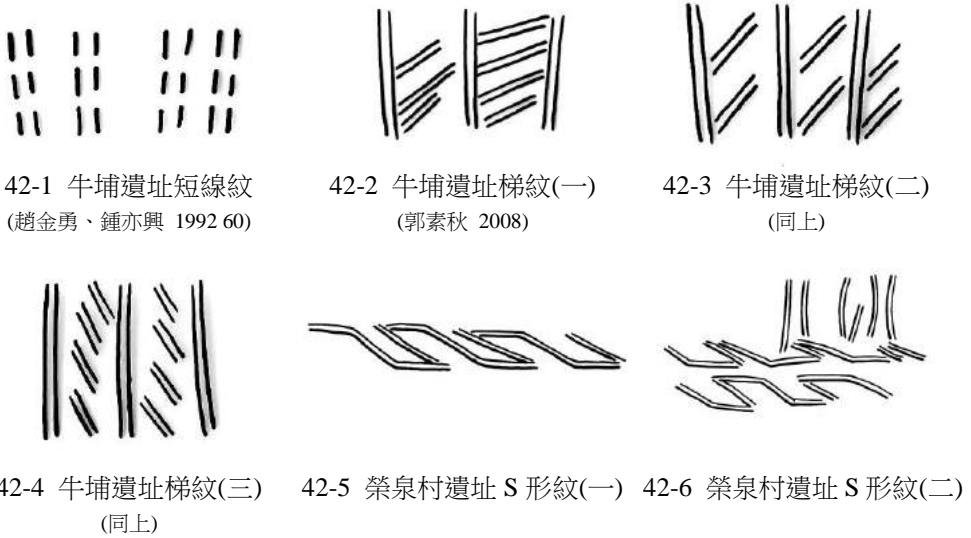


圖 42 牛埔遺址及榮泉村遺址圖案

七、西部紋飾特色

綜合上述，8 處遺址陶片紋飾案例都可涵括在直線紋、交叉紋、曲折紋、梯紋及 S 形紋、小波浪紋等 6 類圖案中，直線系及弧線系紋飾在同形案例中可見 1 至 4 線之變化，直線系紋飾少數可至 6 線，而 1 線及 6 線都屬少數，主流為 2 線紋飾。其中尤以 S 形紋及梯紋最具特徵，S 形紋能表現線條之優美，梯紋則多結合其他紋飾組成複雜圖案。

標本數量較多的芝山岩遺址及八甲遺址出土 6 類紋飾案例，孔宅遺址及六合遺址除小波浪紋外，其他 5 類皆有，大埕坑遺址則出土 S 形紋外的其他 5 類紋飾，數量較為稀少的遺址亦見典型紋飾如 S 形紋及梯紋，東部遺址則有港口遺址 6 類紋飾皆具，如此一來初步證實 6 類紋飾分布全臺，形成大埕坑文化刻劃紋傳統。

發展較早的西部紋飾與東部紋飾有許多類同之處，但亦具有東部紋飾缺少之特色：

- 1、紋飾配合施紋空間設計。西部陶器口緣類型多於東部，陶器似在因應使用目的外，亦創造出可施紋空間，因此施紋空間變化較多，各型口緣在口部(含附屬部位)高矮、寬窄、厚薄及開口角度斂放等方面的變化，產生的施紋部位寬度、厚度、角度各有不同。

施紋空間形成後，選取紋飾並依可用空間而調整大小。以長期流行之基本曲折紋為例，多線曲折紋施於斂盤口罐上腹部，施於斂口鉢，亦施於敞口罐口緣面，折曲紋常以短紋表現，施於較大面積則複雜化為梯狀或複合圖案，然複雜圖案不侷限在面積較大部分，口緣面亦可施作複合圖案。S 形紋圖案伸縮彈性亦極高，可縮小施於斂盤口外側及寬度小於 1cm 之口緣唇面，亦可放大施於陶罐上腹部、陶鉢口部等較大寬面。

- 2、紋飾圖案布局完整度高。西部紋飾在橫式、直式帶狀紋飾或塊狀紋飾外圍以長、短線界定圖案之完整性，尤其與頸部或肩線常以橫線或其他自然形印紋(如豆形印紋)作出區隔，增加圖案穩定及均衡感。東部紋飾保留直式框線，而少見橫式框線區隔肩頸之施作表現。
- 3、基本紋飾種類多於東部，且施作良率高。紋飾中除自然形印紋如圈印紋等未見於東部外，幾何紋飾如芝山岩遺址陶鉢裝飾的單線曲折紋與單線菱格紋，亦未見於東部，此類紋飾即使在西部亦屬稀有案例，或與地區及發展時間有關，可能屬早期紋飾。反觀東部紋飾組合圖案比較多，但其組成元素圖案均可溯自西部已知圖案，並在線條形式產生變化，顯示承自傳統基礎所產生的發展與變化。

在施作方面，西部紋飾線條穩定均勻之案例不少，而圖案之組成線條常見 1 至 4 線之變化，直線系最多並可見 6 線紋飾，線條數高於東部所見，亦顯示西部施紋技術水準。

- 4、紋飾圖案具動態感及美感。西部紋飾多數圖案講求穩定均衡感，然亦有圖案表現出不均衡所帶來的動態感。例如芝山岩遺址豆形器圈足上的人字交叉紋，線條似有閃動之感。在六合、孔宅遺址可見有以斜線表現斜飛兩絲或流星雨，以大小不同之 S 形紋表現波浪洶湧或浪花朵朵湧現之感。此類表現為東部紋飾所未見。

最後，藉由上述東西部紋飾之簡單比較，顯示大坵坑文化刻劃紋因工匠施作技術穩定性與圖案布局均衡性有其精緻與粗糙之差異，使得觀察者對於線條圖案設計與施作可以用現代美學概念來作評論，並對線條、圖案產生精準或美觀程度的判斷。

八、施紋方式推測

刻劃紋以往多被認為是以並排尖物篋劃而成，然刻劃紋線條本身明顯反映施作技術有其差異，本文根據線跡觀察，推測其施作方式或不止於篋劃之法。

按大坌坑文化陶器紋飾在幾何線條以外，以繩印紋佔器表施紋面積的大部分，此外尚見口緣、肩線之切刻痕及自然形如圈形、豆形等印紋。其中繩印紋已有研究者實驗證明以小木棒纏繩滾壓可達到效果(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 2003:360)，而切刻、圈印則由工具切印、壓印而成，這些已知的施作技術，或可能同樣運用於施作幾何紋飾，只是工具不同，且技術更有其複雜度。以下藉由陶片保存之紋飾線跡觀察，對於施紋方式作推測。

(一)線跡觀察

陶器質地以泥質陶最利於施紋，西部遺址泥質陶及夾砂陶均可見，夾砂陶因摻砂顆粒大小及密度不一而形成變化，夾密集粗砂者比例不高，大多為中低密度之粒徑 1mm 以下砂粒，以石英砂為基本元素，並受地理環境及地質影響，可見夾密集石英、長石、輝石粗砂、砂岩顆粒，甚至貝砂。胎土中的砂粒成為線跡觀察時的一項證據。

由於手持篋狀有機物工具劃動易將胎泥及所夾砂粒翻起，尤其多線條紋飾的施作，劃動很容易受到胎土阻力而失敗，而且容易施力不均而使線槽深淺不一。此外多線施作時相鄰線條互相破壞，無法劃出精準之平行多線，若施作交叉線條則後線很容易破壞前線。

而觀察多數大坌坑文化刻劃紋之多線條紋少見胎泥翻起，且線槽大多深而均勻。此外在摻雜可見砂較多的陶片觀察中，其線條經過器表粗砂時通常將之壓下而非翻起，顯示壓印的效果。再者在线條交接重複處可見後線壓在前線之上，而且交接處未破壞前線結構，亦顯示壓印的效果(葉美珍 2014)。

(二)施紋方式推測

西部遺址紋飾施作線跡中殘留線廓者較少，觀察線痕後推測其施紋方式包括除刻劃外，可能包括切刻、滾壓、壓印等已知技術，其中刻劃紋飾線條通常較不工整，而線條工整圖案可能由切刻及較複雜的滾壓、壓印技術造成。

1、刻劃或篋劃，指持尖狀工具劃動形成圖案。例子並不多，通常線條較不工整，而且多為單線而非等距的多線條。其中包括部分波浪紋，例如在東部港口遺址觀察到單線波浪紋未完成而中止，而西部遺址部分線條不工整之波浪紋可能為手工刻劃而成。此外尚有部分案例如孔宅遺址之單線梯紋口緣(圖版 50)，其線條不均、歪斜而線槽淺，較明顯為刻劃而成。

2、壓印

壓印技法包括切刻、滾壓及壓印等，工具可能是光滑而略具硬度材質如貝類、魚骨類、獸骨類或板岩薄片，以薄片斷面壓印，或修成小型圓片或圈環套入木棒

持以滾壓。壓印技術可能頗複雜，而且視圖案所需，技法可能綜合使用。

首先，以直線而言，手工刻劃的直線其線條淺而歪斜，穩定而線槽深的單條直線可能來自切刻。按大坌坑文化陶器常見口緣或突脊部位帶切刻痕，而有些單線網格紋即可能由拉長切刻動作所造成。此類線條特徵是筆直而線槽深又細，線槽兩端趨於尖細，卑南遺址出現高比例具切印特徵之網格紋，六合、孔宅遺址亦可見少量網格紋，線槽亦相當細，推測若以極細薄貝片或板岩薄片順弧度稍作切印可得此效果。

由於陶器表面不同弧度有其施作難度，密集而整齊的印紋很難由併排尖物刻劃而成，均勻穩定的多線條可能來自滾壓、壓印。製作時可因應弧度選擇技法及工具，在較平直的器表若施短線條可合併數片薄片壓印多條直線，或單片重複施作。在弧度較大的器表，以滾壓比較有利於控制長線條形如曲折紋、梯紋，尤其有些圖案直線長達 10 公分以上，滾壓可使線條拉長，線條交接重疊處，後線蓋過前線而不會在交接處破壞前線形狀。此外亦可在頸部弧轉處或凹弧口緣面施印曲折紋飾。研判這種滾壓技術與繩印紋技法類似，差別在於工具木棍可能套著圓片、圈環或其他適合印出線槽的物質。

其次，就波浪紋而言，部分此類圖案為手工刻劃成，其波浪紋線槽淺而不整齊，易受胎土阻力而停止。有些複雜紋飾顯示波浪線條亦可能壓印造成，明顯案例是芝山岩遺址 2 件陶鉢飾直式波浪紋併直線紋重複施作圖案(圖版 19)。其線條極細而密接，緊密處直線紋觸及波浪紋，直線紋甚至蓋過波浪紋，後者略被壓平，但直線紋並未破壞波浪紋形狀。其中一陶片摻粗砂而器表局部剝蝕，即使如此，壓印力道使得紋飾局部線槽仍留存在多砂的胎壁，顯示其複雜壓印技法。推測若以類似扇貝之薄片斷面重複壓印波浪紋，另以極薄片材斷面壓印直紋可得此效果。

S 形紋最具美感而施紋難度亦最高，研判部分較不工整的 S 形紋可能由刻劃而成，但較精美的 S 形紋似亦係以巧妙技術滾壓而成。按弧線完整之 S 形線少見，多分解為兩端各一短線，中間為長弧線之組合，或可能亦是受限於工具與施作方式的結果，而 S 形紋美觀與否主要即來自中間長弧線之精準程度。

推測其壓印工具亦可能是以貝質、板岩質圓形小薄片或圈環，套鑲在小木棍如小滾輪持以滾壓。圓片可能有不同尺寸，各有其功能，圓片或圈環直徑越小越容易轉動以施作弧形線條。弧線施作相對難度高，也因此僅觀察到少數 S 形紋弧度完美，通常 S 形紋多稍作折曲化，至東部案例就已直線化了。

以上初步推測歸納自本文對陶片紋飾線痕之觀察，有待後續研究與驗證。

九、結語

綜合前面章節所述，西部大坌坑文化 8 處遺址刻劃紋飾包含 6 類圖案，分別是直線紋、交叉紋、曲折紋、梯紋及 S 形紋、小波浪紋等，此 6 類圖案除少數早期紋飾外，均可於東部找到類似形，尤其在港口遺址 6 類紋飾皆具，亦多見西部紋飾直接類似形，證實 6 類紋飾於大坌坑文化存續時間內傳布全臺，應可作為紋飾傳統的具體內容。

6 類紋飾反映大坌坑文化陶器工匠巧妙之施印技術，紋飾線跡觀察顯示，刻劃紋飾之施作應包含切刻、圈印(即壓印)等已知方法，甚至運用類同於繩紋施作之滾壓技法，亦即繩紋與刻劃紋飾之施作為整套技法，端視紋飾型態之需要而選擇運用。

由西部圖案布局與線條表現，顯示各地大坌坑文化陶匠在刻劃紋有其施作精準度之差異，其中自由刻劃的紋飾技術差異不大，而可製作工整、複雜圖案的壓印技術是影響精準度關鍵。研判各遺址所表現紋飾技巧差異除來自個別工匠技術高低外，或如同繩印紋之變化，幾何紋飾之壓印施作方式亦有其時間性興衰、變遷之可能性。因施紋相關技法有其複雜度，需持續對陶器紋飾觀察與研究，並進行相關施作實驗加以驗證。

由於 6 類紋飾的長期傳布與施作，紋飾傳統對於大坌坑文化族群顯然有其重要意義，那麼紋飾的發展、製作與意義探討確可成為大坌坑文化研究議題。後續研究將會綜合東、西部紋飾，輔以年代及器形等資料，專題探討紋飾傳統之傳承與變遷，屆時東、西部紋飾並列，更能顯現其中的傳承與變化，並據以推測其發展過程。

此外，基於紋飾在大坌坑文化族群有其傳承性，那麼紋飾應可作為文化溯源之參考證據。研究東部紋飾時曾以具特徵之帶脊陶器(即盤口陶器)及刻劃紋圖案來探索外在環境之類似形(葉美珍 2014)，西部紋飾系統因可能存在大坌坑文化之早期紋飾而更具關鍵性，其紋飾溯源有待合併東部紋飾作後續探討。

最後，由於大坌坑文化陶器紋飾保存機率低，本文所討論之已發表或新發表紋飾案例均有其重要性，有待以之為基礎，持續蒐集新出土案例以擴充紋飾傳統內涵，進而建立大坌坑文化紋飾圖譜，將有助於紋飾相關議題之研究。

參考文獻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桂林甌皮岩遺址博物館、桂林市文物工作隊編

2003 《桂林甌皮岩》。中國田野考古報告集考古學專刊丁種第 69 號，北京：文物出版社。

朱正宜、楊鳳屏、鍾亦興等

2014 《鹽水溪大昌橋遺址搶救發掘計畫期中報告》。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局委託，庶古文創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執行。

宋文薰、張光直

1964 〈圓山文化的年代〉，《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23、24 期合刊 1-11。

何傳坤

1977 〈臺中縣大肚山臺地及彰化、南投縣境八卦山臺地史前文化調查報告〉，收錄於張光直編《臺灣省濁水溪與大肚河流域考古調查報告》，頁 27-64，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所。

2000 〈彰化地區史前文化〉，《彰化文獻》創刊號：5-28

何傳坤、屈慧麗

2001 《新竹縣新埔鎮犁頭山遺址考古發掘暨監測報告》。臺灣高鐵工程 C220 標亞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託，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執行。

邱水金、朱正宜

2013 《鹽水溪(大昌橋至八甲橋)疑似遺址調查鑽探評估》。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局委託，財團法人樹谷文化基金會執行。

李匡悌、臧振華、朱正宜

2013 〈研發與創新：談南科園區出土大坌坑文化的陶器叢集〉，《土理土器》臺灣史前陶容器特展標本圖錄，頁 28-62，臺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李德仁主編

2003《郭德鈴先生收藏史前暨原住民文物圖錄》，臺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蕭山博物館

2004《跨湖橋：浦陽江流域考古報告之一》。北京：文物出版社。

郭素秋

2008《彰化縣遺址普查計畫第一期-彰化市、福興鄉、花壇鄉、芬園鄉、員林鎮》。
彰化縣文化局委託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之研究計畫報告。

郭素秋、劉益昌

2005《金門移民適應與遷移調查研究(史前期)》。內政部營建署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委託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之研究計畫報告。

2006《金門移民適應與遷移調查(史前時代後期)研究》。內政部營建署金門國家公園
管理處委託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之研究計畫報告。

夏麗芳主編

2004《盧錫波先生收藏考古標本圖錄》，臺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陳有貝、陳俊廷

2013《仁德文華路二段與 2 號計畫道路交叉口牛稠子遺址搶救計畫》。臺南市文化
資產管理處委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執行。

陳義一、李坤修、葉美珍

1998 《東西向快速公路高雄-潮州線沿線遺址考古搶救發掘報告》，台灣省公路局
東西向快速公路高南區工程處委託，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執行研
究計畫報告。

黃士強

1974〈臺南縣歸仁鄉八甲村遺址調查〉，《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35、36 期
合刊，頁 62-68。

1984《臺北芝山巖遺址發掘報告》，臺北市：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1989〈臺北市圓山遺址第二地點試掘報告〉，《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45期，頁20-65。

張光直編

1977《臺灣省濁水溪與大肚溪流域考古調查報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葉美珍

2010〈花蓮縣港口遺址繩紋陶文化初探-2001年試掘出土繩紋陶片之分析〉，《田野考古》第12卷1、2期合刊，頁133-183。

2013〈原鄉記憶：談長光遺址大坌坑文化陶器〉，《土理土器》臺灣史前陶容器特展標本圖錄，頁63-75，臺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2014〈臺灣東部大坌坑文化陶器刻印紋初步研究-以東海岸六處遺址為例〉，《田野考古》第17卷1期，頁19-58。

楊鳳屏

1997《鳳鼻頭遺址早晚期文化的傳承與變遷：以陶容器為例》，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福建博物院編著

2004《閩侯曇石山遺址-第八次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

廣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南寧市博物館編著

2007《廣西先秦岩洞葬》，北京：科學出版社。

臧振華、李匡悌、朱正宜

2006《先民履跡》南科考古發現專輯，臺南縣：臺南縣政府。

臧振華、陳仲玉、劉益昌等

1994《臺閩地區考古遺址：高雄縣、高雄市》。內政部委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執行研究。

- 1995 《臺閩地區考古遺址：臺中縣、臺中市》。內政部委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執行研究。

臧振華、葉美珍等

- 2000 《臺閩地區考古遺址：臺東縣・澎湖縣》。內政部委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執行研究。

趙金勇

- 2012 《新北市八里到林口海岸新石器時代出水陶器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新北市十三行博物館委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執行計畫報告。

趙金勇、鍾亦興

- 1992 〈彰化縣彰化市牛埔遺址調查報告〉，《田野考古》第3卷2期：49-66。

劉益昌

- 1994 《鳳鼻頭遺址的範圍與文化》，高雄縣政府委託，「鳳鼻頭遺址範圍研究計畫」期末報告。
- 1997 《臺北縣北海岸地區考古遺址調查報告》，臺北縣立文化中心委託，中國民族學會執行研究。
- 1999 《存在的未知-臺中地區的考古遺址與史前文化》，臺中縣：臺中縣立文化中心。

劉益昌、陳仲玉、郭素秋等

- 2004 《臺閩地區考古遺址：南投縣》，內政部委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執行研究。

劉益昌、陳仲玉、陳光祖等

- 2004 《臺閩地區考古遺址・臺北縣、基隆市、臺北市》，臺北：內政部。

劉益昌、陳俊男等

- 2007 《臺中縣考古遺址普查與研究》。臺中縣文化局委託，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考古學研究專題中心執行研究。

劉益昌、潘常武等

2000 《臺東縣史前遺址-海岸山脈東側與綠島》，臺東縣政府委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執行研究。

劉益昌、許清保、顏廷仔

2008 《臺南縣考古遺址調查與研究計畫-第一期溪北地區》，臺南縣政府委託，台灣打里摺文化協會執行研究。

劉益昌、顏廷仔等

2010 《臺南縣考古遺址調查與研究計畫-第二期溪南地區 11 鄉鎮》，臺南縣政府委託，台灣打里摺文化協會執行研究。

顏廷仔

2013 〈高雄市路竹區新園遺址考古試掘結果暨相關研究問題〉，《田野考古》第 16 卷第 1 期，頁 85-118。

Chang, Kwang-Chih

1969 Fengpitou, Tapenkeng, and the Prehistory of Taiwan. Yale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in Anthropology, 73. New Haven: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Yale University.

Dewar, Robert E., Jr.

1977 〈牛罵頭、頂街與舊社三個遺址考古報告〉(Niu-ma-tou, Ting-chieh, and Chiu-she: A Report of the Archaeology of Three Sites in Tatu River Valley)，收錄於張光直編《臺灣省濁水溪與大肚河流域考古調查報告》，頁 65-162，臺北：中央研究院



圖版 1 大埕坑遺址陶罐口緣(一)



圖版 2 大埕坑遺址陶罐口緣(二)



圖版 3 大埕坑遺址陶罐口緣(三)



圖版 4 大埕坑遺址陶罐口緣(四)



圖版 5 大埕坑遺址陶罐口緣(五)



圖版 6 大埕坑遺址陶罐口緣(六)



圖版 7 大埕坑遺址斂口鉢口緣



圖版 8 大埕坑遺址陶器折肩殘片



圖版 9 芝山岩遺址陶罐口緣(一)



圖版 10 芝山岩遺址陶罐口緣(二)



圖版 11 芝山岩遺址陶罐口緣(三)



圖版 12 芝山岩遺址陶罐口緣(四)



圖版 13 芝山岩遺址陶罐口緣(五)



圖版 14 芝山岩遺址陶罐口緣(六)



圖版 15 芝山岩遺址陶罐口緣(七)



圖版 16 芝山岩遺址陶罐口緣(八)



圖版 17 芝山岩遺址陶罐口緣(九)



圖版 18 芝山岩遺址陶器圈足殘片



圖版 19 芝山岩遺址斂口鉢口緣(一)



圖版 20 芝山岩遺址斂口鉢口緣(二)



圖版 21 芝山岩遺址斂口鉢口緣(三)



圖版 22 芝山岩遺址斂口鉢口緣(四)



圖版 23 芝山岩遺址直口鉢外側紋飾



圖版 24 芝山岩遺址直口鉢內側紋飾



圖版 25 六合遺址陶罐口緣(一)



圖版 26 六合遺址陶罐口緣(二)



圖版 27 六合遺址陶罐口緣(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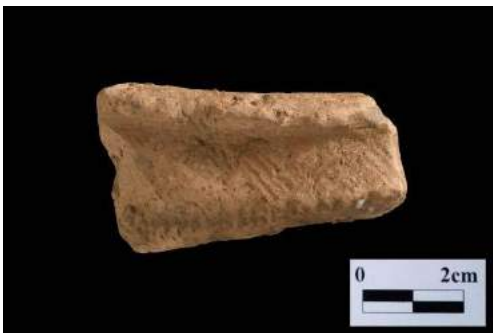
圖版 28 六合遺址陶罐口緣(四)



圖版 29 六合遺址陶罐口緣(五)



圖版 30 六合遺址陶罐口緣(六)



圖版 31 六合遺址陶罐口緣(七)



圖版 32 六合遺址陶罐口緣(八)



圖版 33 六合遺址陶罐口緣(九)



圖版 34 六合遺址陶罐口緣(十)



圖版 35 六合遺址陶罐口緣(十一)



圖版 36 六合遺址陶罐口緣(十二)



圖版 37 六合遺址陶罐口緣(十三)



圖版 38 六合遺址陶罐口緣(十四)



圖版 39 六合遺址陶器折肩殘片



圖版 40 六合遺址陶器腹片



圖版 41 孔宅遺址陶罐口緣(一)



圖版 42 孔宅遺址陶罐口緣(二)



圖版 43 孔宅遺址陶罐口緣(三)



圖版 44 孔宅遺址陶罐口緣(四)



圖版 45 孔宅遺址陶罐口緣(五)



圖版 46 孔宅遺址陶罐口緣(六)



圖版 47 孔宅遺址陶罐口緣(七)



圖版 48 孔宅遺址陶罐口緣(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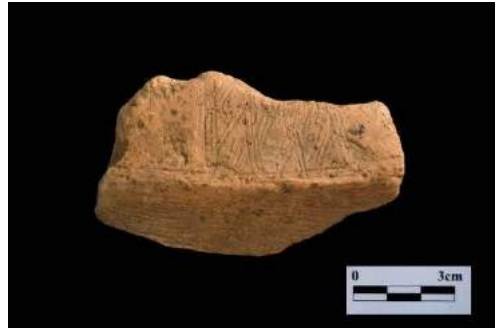
圖版 49 孔宅遺址陶罐口緣(九)



圖版 50 孔宅遺址陶罐口緣(十)



圖版 51 孔宅遺址陶罐口緣(十一)



圖版 52 孔宅遺址折肩片



圖版 53 孔宅遺址鉢口緣(一)



圖版 54 孔宅遺址鉢口緣(二)



圖版 55 八甲遺址陶罐口緣(一)



圖版 56：八甲遺址陶罐口緣(二)



圖版 57 八甲遺址陶罐口緣(三)



圖版 58 八甲遺址陶罐口緣(四)



圖版 59 八甲遺址陶器腹片



圖版 60 八甲遺址陶鉢腹片



圖版 61 新園遺址陶罐口緣(一)



圖版 62 新園遺址陶罐口緣(二)



圖版 63 網寮遺址陶罐口緣(一)



圖版 64 網寮遺址陶罐口緣(二)

Research on Impressed and Incised Designs on Ta-pen-keng Culture Pottery of Western Taiwan in the Collections of National Museum of Prehistory

Mei-chen Yeh^{*}

ABSTRACT

Cord-marked pottery with geometric incised patterns is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trait of the Ta-pen-keng culture (6500-4200 BP), the beginning of the Neolithic stage in Taiwan. This paper presents first-hand data on features of impressed and incised motif patterns observed on more than 200 cord-marked pottery sherds of the Ta-pen-keng culture from sites distributed in western Taiwan. The cord-marked pottery data was donated by colleagues or collected by the author in 20 years of fieldwork. The sher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following 8 sites, going from north to south: the Ta-pen-keng site and the Chih-shan-yen site in Taipei; the Jung-chuan-tsun site in Taichung, the Wang-liao site and Pa-chia site in Tainan, and the Liu-ho site, Kung-chai site, and the Hsin-yuan site in Kao-hsiung. The amount of cord-marked pottery sherds collected from each site varies considerably, with most having been collected from the Chih-shan-yen, Liu-ho, and Kung-chai sites.

The motif patterns observed from the above sites include straight line series and arc line series. The straight line series consists of four types of patterns: straight lines, crossed lines, zig-zag lines, and oblique parallel lines shaped like a ladder. The second series consists of two types of patterns: S-shaped lines and arc zig-zag lines shaped like small waves. Each type in both series feature a diversity of patterns from single line to multi-line. Six motif pattern types were found at the Chih-shan-yen site and the Pa-chia site, and five types were found at the Liu-ho site and the Kung-chai site.

* Associate Researcher, Division of Research and Collection, National Museum of Prehistory.
yemt@nmp.gov.tw

The 6 sites in eastern Taiwan are, from north to south, the Yen-liao site and the These six types of motif patterns are also found in several sites located in eastern Taiwan. The author compares the motif patterns with data published in 2014 collected from 6 sites located in eastern Taiwan in order to emphasize those traits from patterns observed in the western Taiwan sites.

Kang-kou site in Hua-lien, and the Chang-kuang site, Pa-sang-an site, Chih-tien site, and the Pei-nan site in Tai-tung. Similarities and developmental relationships exist between patterns from western and eastern Taiwan .

According to observation of the incised grooves of line patterns, the author suggests how the pottery makers may have incised the patterns; the author also considers the aesthetics of the patterns.

The conclusion of the paper is that the patterns impressed and incised on pottery of the Ta-pen-keng culture developed to be a nearly stable tradition over 2,000 years. The patterns are indicative of something important to the Ta-pen-keng pottery makers, and their stability also implies about the significance of inheritance. The motif patterns might indicate a series of historical markers of the Ta-pen-keng culture.

Key Words : Ta-pen-keng culture, impressed and incised motif patterns observed on cord-marked pottery, the Chih-shan-yen site, the Liu-ho site, the Kung-chai site